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
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8 年)

目录

我，决不因恐惧而否认	2
为合理解决“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司法纠纷而呼吁社会各界关注的倡议	6
警惕极左派破坏对“广州读书会八青年”的声援工作	10
关于“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关注团工作程序问题的建议	12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14
不要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29
话实同志的“帝国主义论”	31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38
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43
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笔记	49
佳士运动的争论与反思	56
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	61
行动中的红色中国网	70
信奉“中帝论”的朋友们，你们真相信中国革命是可以胜利的吗？	75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78

我是顾佳悦，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6 届毕业生，马克思主义者。被广州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网上追逃。

近期，此事相关的青年同志相继发声，我也看到左翼同志、许多派别的理想主义者、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声援。

无论面临如何的压力，我辈不会辜负青年的使命。

这是我的自白，也是我作为左翼青年的宣言。

我，决不因恐惧而否认——顾佳悦的宣言

（2018 年 1 月 23 日）



当你看到这篇文章之时，我已被全网追逃，即将身陷囹圄。
在此，我亲身回应猜疑与流言。

我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关系融洽的家庭。
彼时小小的我不知道同龄人的境遇，不知道黔西南的煤窑童工，大凉山的留守儿童，生活无忧无虑地像一瞬间。
傻白甜的生涯在看到校门口的乞丐时裂开了一道缝，肮脏头发和失神眼睛，本来就扭曲的胳膊有一端烂掉了。

那端烂掉的胳膊打开了我通往现实的一扇窗。
这是我最初的困惑和冲动，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叫做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师长和亲戚都教育我不要再给乞丐钱了，觉得我是个偏执愚蠢的孩子。
于是某天，我强行闭上，黏在烂掉胳膊上的我的眼睛；心中默念，不能乱给乞丐钱，不能乱给钱，不能给钱，不能不能……真的感觉，默念这句话的几百米，远比一个孩子的一生漫长。
我还是回头了，飞奔将零花钱放在了搪瓷缸里，如释重负。

现在想来，这次回头无疑是未来的伏笔。
最终我明白零花钱仅仅是杯水车薪，确实没用。可是更大的拷问袭来：为什么会有烂掉的胳膊在寒风中发抖，为什么我能衣食无忧，而有些人的生命与尊严只值几个钢镚儿？
对不幸者的愧怍，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或许有人会翻出我的成绩单，证明我算半个学霸，算个“北大精英”。谢谢你们，可我不喜欢这个标签。
所谓独善其身，无非冷漠的托词；所谓个人奋斗，无非利己的变种。

大学曾经有很多选择，联想到半截胳膊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残酷的现实，我毅然决然地选择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我一度非常努力想成为一个好大夫，可是越努力，越无力。
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说起来已不轻松，背后更不是看客能够承担的重量。
一个母亲的三胞胎，全部患病，倾家荡产只能救活一个孩子。她在三个一模一样的孩子中做出抉择。不用煽情描述，足以感到所在非人间。

钱，贫富差距，阶级固化，许许多多疾病之外的东西，杀人不眨眼。
逐渐别无选择，我必须做到更多。
逐渐感同身受，契诃夫的深情，鲁迅的冷眼，格瓦拉的丛林生涯，白求恩的客死异乡。
小医医病，中医医人，大医医国。

受朴素的愿望驱使，我和同样在思考社会，关注底层的一群人汇合在北大，我最终找到了解释世界的钥匙，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看到赤脚医生的微笑，看到城市老爷卫生部轰然倒塌；我看到妇女顶起了半边天，看到翻身农奴沐浴高原春光；我看到人民群众终于站起来，看到他们当家做主的伟岸身影。

这就是我具象化的理想。马列毛的逻辑和内容，理论和实践，哲学名词和历史细节，多么希望有机会，能从容地和你慢慢聊。

我们并不老气横秋，沉湎历史；更不特立独行，自我标榜。我们秉持平等的信念和理想的精神，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老工人的风云故事和谆谆教诲，新底层的三座大山和逐渐觉醒，学校内志同道合者的逐渐汇聚，后勤工人调研引发的全民热议，让我从一个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学生。

我终于学会笑对世俗的偏见和精英的假面，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弥深弥坚。

这种情感，让我挥别了可爱的同窗。

作为八年制本博连读的医学生，我中止了学业。

——我不在乎个人前途越走越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总会越走越宽的。

在工作之余，我参与进步学生的读书会，宣扬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让许多年轻学子找到了人生方向，也让我们结识了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同路人：叶建科、孙婷婷、郑永明等——而今，他们有的已经身陷囹圄，有的即将身陷囹圄。

云帆被带走的读书会我不在场，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意外自己被追逃——既然，读书会广场舞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极端思想”——那如果我不被追逃，就说明我不配为左翼青年！

在此敬告番禺警方：我决不否认参加过读书会；决不否认和同学们讨论过社会主义，讨论如何改善工农境遇，讨论如何面对社会黑暗面；决不否认我曾带着校工阿姨跳舞唱歌，而且很快乐，决不“悔过”！

我决不因为恐惧而否认：

我，是左翼青年，我，坚持社会主义理想。

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难道这些有罪吗？！难道这些，是抓捕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理由吗？！

我，不敢说理解苦难重如山，不敢说怀抱理想高于天，但是心有勇气，改变于万一。

今日即将身陷囹圄，虽有不甘，从未后悔。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青年人追求理想的权利，燃尽青春，在所不惜。

请你，不要想象一个青年在铁窗之内的悲哀场景；

请你，接过我的勇气和力量，为共同的理想奔走呼号；

在我不在的日子里，代我对亲友不抛弃，对信仰不放弃；

——代我忠于劳动人民，永不止息。

致同路人

思我同志，如足如手。

念我工农，谁护谁佑。

牢狱之难，无惧无愁。
众志成城，解难解忧。
长路暂别，莫失莫忘。
愚公移山，不死不休。

顾佳悦

2018. 1. 23

**为合理解决张云帆等“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司法纠纷
而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的倡议
(2018年1月24日)**

自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四青年因在广东工业大学举办读书会一事被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刑事拘留以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虽经海内外各界数百名人士联署呼吁，又经多方努力，上述四青年已被取保候审，但仍未结案；此外，又有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四青年被番禺警方列入网上追逃名单。截至目前，该案尚未得到合理解决。

上述诸青年，先是被番禺警方冠以莫须有的“涉嫌非法经营”，后又被指控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和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

张云帆等诸青年和其他关注社会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了广博知识、认识社会、深入实践、体察民情，以读书聚友的形式交流联谊，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范围内的正常行为，也是有志青年应有的健康追求。他们读书、讨论、交朋友，既没有破坏教学，也没有妨碍任何人的生产营业，更没有干扰番禺警方的日常工作，何谈“扰乱社会秩序”，更无所谓“情节严重”！倒是番禺警方，违背有关法律规定，滥用专政手段，将张云帆等四青年非法拘押多日，使得他们蒙受不公正的待遇，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责任。

上述诸青年在参与读书会活动中，难免对一些现实和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青年，作为国家的公民，张云帆等有权利关心国家大事，议论中外古今。当然，作为青年人，在评论历史与现实时，可能有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有错误的意见，还可能有一些虽然正确但是片面的意见。但只要他们的言行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这些思想问题都是正常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早在1957年，毛泽东主席就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等专政手段只应当用于解决与敌我矛盾有关的问题，而绝不当用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如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只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2017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党校都发表文章，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发表七十周年；《解放军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了题为“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2017年11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向大会所做报告

中也指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第八部分，第六小节）。

目前，我们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当前这个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应当有更大的自信，以更加积极、更加妥善的方式来解决广大青年的思想问题。

张云帆等青年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书斋之中，也没有拘泥于个人的算计，做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敞开胸怀、投身社会，关心国家大事，为学校食堂的叔叔、阿姨们丰富文化生活。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在今日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里，哪里有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绝大多数的青年，就是想要“谨言慎行”、“莫谈国事”，专心于个人的发达，又有几人能成功？无论是富士康的工人还是高等院校的博士生，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愤而自杀的，不在少数。今日中国，是需要更多的钻进个人主义死胡同的自杀青年，还是需要更多的像张云帆等同学那样以社会为己任的先锋？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张云帆等青年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的热情，有关方面应当珍惜和保护，并加以适当引导，而不是滥用专政手段粗暴处理。为了解决这一事件，我们郑重劝告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四青年于近日前往北京公安机关当面说明情况，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我们做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相信，北京是我国首都，离党中央近，有比较高的政策水平，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党的政策以及相关法律的精神。我们希望，北京公安机关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与广州公安机关沟通，促成广州公安机关尽快取消对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四青年的取保候审措施，并取消对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四青年的网上追逃决定，使得上述八青年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为了敦促这一事件尽快得到合理解决，我们同时倡议，由社会各界一切关心八位青年的人士组成临时关注团，负责了解关注“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的发展进程，一方面向社会各界公布案情进展，另一方面及时向有关方面提出解决该事件的合理建议。

在该事件尚未得到合理解决之前，关注团应负责帮助张云帆等八青年解决他们因目前的司法纠纷而带来的各种困难，包括为张云帆等青年提供临时住所和其他生活便利。

我们希望并且相信，经过北京公安机关的斡旋，广州公安机关能够用合乎法律和理性的方式解决这一事件。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幸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话，我们愿意与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八位青年同荣辱，共进退。

凡赞成本倡议并自愿参加张云帆等“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司法纠纷关注团的人士，请将您的姓名、职业等信息发送到如下信箱：

guanzhu2018@gmail.com

签名（签名方式：真实姓名+所在地及身份）

古正华	新四军老战士 湖北日报社离休干部 笔名丑牛
张耀祖	北大校友 原中国工人网主编
陈洪涛	红色参考主编
张勤德	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
李平	原北京叉车总厂党委书记
黄纪苏	北京学者
李民骐	北大校友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教授
许准	北大校友 美国霍华德大学助理教授
陈瀛	美国新学院大学助理教授
宋阳标	媒体人
李程之	《工人日报》离休干部
范景刚	乌有之乡网站长
胡澄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马青柯	中国红色历程研究会会长
李新政	中美商学院副院长
杨晓陆	北京爱国学者
王中宇	北京爱国学者
老田	左翼学者
时迈	毛泽东旗帜网站长
杨铁	中科院研究员

王朝晖	中科院研究员
吴敬堂	通钢工人代表
李甲才	西安左翼人士
李定凯	清华大学教授
亓平言	清华大学教授
朱进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柴晓明	北京大学教师
魏国锋	北大校友
杨聪雷	北大校友
胡乔杰	北大校友
张国领	北大校友
张亚辉（张伢子）	媒体人
林林	旅美华人（原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
李江	广州左翼人士
宋书星	山东大学退休教师

2018年1月24日发起

（至2018年2月1日，共1358人参加联署）

警惕极左派破坏对“广州读书会八青年”的声援工作

（2018年1月28日）

远航一号

自三十多名海内外知名人士发起“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关注团以来，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相应。广东警方也已经与八青年代表有所沟通，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有部分以极左面貌出现的青年积极分子，不仅不积极参与声援工作，反而冷嘲热讽，污蔑关注团是“劝降”、是“跪舔”，是“丧失气节”的机会主义。

与此同时，他们正在煽动张云帆等八青年，撇开关注团，另搞一套所谓“立场鲜明”的声明，提出若干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要求。这份声明，一旦发出，将陷八青年于六亲不靠、进退维谷之地。寒了关注团广大参加者的心，是为六亲不靠；只想着冲锋，而全然不顾客观条件，一旦跌入陷阱，无所适从，是为进退维谷。

试想，该声明的各项不切实际要求，势必不能实现。声明一旦失败，张云帆等八青年又当如何呢？特别是尚在被追逃、不能外出、不能旅行、更不能工作的四青年又当如何呢？他们背后的家庭又会怎样呢？

如果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各位极左派朋友可有妙计为八青年排忧解难？如果时日拖延，八青年中的一人或数人，不得已与警方接触，到时会不会有极左派朋友不但不同情，反而变本加厉给他们扣上“投降”的帽子？

如果八青年经不住极左派分子的蛊惑，高调发出强硬声明，到头来却不免走回头路，社会上一般群众的观感将是如何？在你们寒了关注团的心以后，就是我们再想帮你们，群众工作还怎么做？

我个人认为，关注团声明是正确的，有理有节，并且有利。那就是，首先争取解除四青年网上追逃，其次争取八青年的完全自由。张云帆等同志，广东警方强加给你们的罪名，人民是不承认的。这样的“罪名”，决不会丝毫有损于你们的名誉，反而是你们的光荣！你们怕什么呢？你们连坐监狱都不怕，难道还怕向警方“说明情况”、展开说理斗争？

反过来，如果现在不能审时度势，冒然逞强，一旦局面无法收拾，前倨后恭，反而将落得个“投降”的名声，百口难辩。

如果事情不幸走到那样一步，各位极左派朋友，你们敢负责吗？负得起责吗？张云帆等八青年离开了关注团，去依靠你们，而你们靠得住吗？

关于“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关注团工作程序问题的建议 (2018年3月7日)

致关注团全体成员：

各位同志，经 35 名社会各界人士倡议，约 1500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华人联署，于今年 1 月 24 日成立了“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关注团。自关注团成立以来，进行了大量工作，为合理解决八青年司法纠纷做了应有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目前，各方面情况都在发生变化。近日，关注团首席发起人古正华同志在会见一位青年代表时明确指出：当前条件下，关注团应当以“不了了之”来应对对方的“不了了之”。古老的这一指示，各位同志可以向该青年代表求证，或者直接向古老求证。

根据古老的这一指示并且根据目前变化了的情况，我建议，应当重申并且明确关注团已有的各项工作程序。

首先，关注团既不是组织，也不是固定团体，而是作为个人的社会各界人士为了一个特定目的而形成的临时组合。因此，以关注团名义进行的一切行动和对外发布的一切文件，都不能简单地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更不能由少数积极分子来包办代替，而必须经过全体关注团成员的同意方可实施。

大家知道，关注团关于关注八青年司法纠纷的倡议书是经过上述约 1500 名社会各界人士以明确的、可核查的方式参加联署的。

2 月 6 日，关注团代表又向公安部信访部门递交了关注团致公安部主要领导的联名信。这封信，先是由在北京的关注团成员进行了初步酝酿；然后召开了有广泛代表性的关注团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形成了一致意见。根据关注团代表会议的一致意见，关注团信箱将联名信草稿通知了所有关注团成

员，并分别根据各关注团成员所表达的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见，修改了联署名单。在完成了上述步骤以后，才由关注团代表向公安部正式递交了信件。

在当前条件下，关注团有必要重申并且明确上述工作程序。凡是要以关注团名义形成新的文件或采取新的行动，首先，应召开有广泛代表性的关注团代表会议（而不是一般性的、非正式的协商会议）。这样的代表会议，至少应当代表关注团所有 35 名发起人，即或者由发起人本身出席，或者由发起人明确委托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所形成的任何决定，最好要建立在所有与会代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特殊情况下，确实需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时，应当明确讨论、投票和形成决定的程序，特别是明确哪些代表有投票权，哪些代表无投票权，以及各位代表的投票权重。

由此形成的决定，仍须由关注团信箱通知全体关注团成员，获得全体团员的同意后（不同意的团员可以选择退出），方可以关注团的名义对外公布实施。

我建议，下次在北京召开有广泛代表性的关注团代表会议时，正式采纳这一建议。在关注团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所有关注团工作人员，应采用上述已有的工作程序作为现阶段的工作办法，以避免各种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

任何个人或小组，如未经关注团代表会议正式授权且未经关注团全体团员同意而采取的行动或对外发表的声明，应由该个人或小组自行负责。

李民骐

关注团发起人之一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2018年6月)

作者：井冈山卫士

前言

为什么“贸易战”中中国一再妥协？减关税，降门槛，买美货，交罚款，美国要什么中国给什么。

为什么“敢打必胜”的中国还要被一再羞辱？印兵进，美舰来，撤导弹，吃“萨德”，别国做什么中国承受什么。

为什么看似凶神恶煞的官僚军警，竟压制不了维权老兵，恐吓不了进步青年，惩办不了讨薪教师，打压不倒罢工司机？

一句话，为什么近年来让某些左翼人士吓得不轻的“中华帝国主义”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本文将和同志们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揭露“中华帝国主义论”的错误，为进一步的阶级斗争做准备。文章第一部分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和相关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路线。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第三部分分析“中华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揭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部分：一溃千里的“贸易战”

第一部分从三个角度梳理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行为。首先是针对关税、金融开放和购买美国产品的全局性态度；其次是“中兴案”集中体现的虚弱本质；最后是相关地缘冲突中的妥协退让立场。

（一）中华物力，与国欢心：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局性妥协

“贸易战”并未“战”，只是中国在做单方面的妥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束手就擒的指导思想。从2018年3月底到4月初，每当特朗普集团提出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进行调查之时，中国商务部总会在口头上做出与美方对等的关税威胁。同时，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也集中表达了诸如“中国不怕打贸易战”，“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等较为强硬的声音。但这种僵持局面被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的讲话打破。在讲话中，习近平承诺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资利益，强化知识产权，降低关税，主动扩大进口，即在原则上答应了美方的所有要求，也冻结了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反击手段。作为纲领性文件，习近平的讲话为后续谈判中的中国官方

定下了基调，即答应美国的要求，以妥协求团结，以退让求共赢。这也无怪乎中国政府的后续行动中基本服从美方好恶。

“种啥买啥”的进口策略。“贸易战”尚未开打之前，中国就向美国下了 370 亿美元的飞机订单，强化了美国在中国大飞机市场的地位；博鳌讲话之后，中国又主动降低汽车关税，向美国汽车敞开大门；5 月底，中美贸易协定又规定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和能源。美国完全达成了其“减少逆差”的谈判目标，以至于特朗普在推特上兴奋地宣布“中国将从我们伟大的美国农场主手里进货，我们种多少他们就买多少！”。特朗普集团所依靠的传统工业、农业和能源资本家的利益全都得到了保障，以至于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搞贸易摩擦的资本集团也被中国的妥协态度所震惊，一时阵脚大乱，降低了对特朗普集团的指责力度。

门户洞开的金融改革。博鳌讲话之后，人民银行第二天就宣布“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今年年底前，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同时宣布了降低银行和保险业市场准入等措施。此举威胁到国家金融主权，降低货币政策效率，同时，美国并未做出对等妥协，反而在中国对美投资领域上屡屡设限。

唯唯诺诺的产权立法。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知识产权是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劳动力、进行不平等交换的手段。在美国压力下被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加强中国对美国的剩余劳动净输出，将中国进一步锁定在为核心国家免费贡献剩余劳动的半外围地位。

败事有余的谈判表现。为修宪和连任寻求支持，也为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灭火，后来担任副总理的刘鹤在今年二月底访问美国。为表现中国不想打“贸易战”的诚意，中国在刘鹤抵美的当天就取消了对美国鸡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刘鹤在谈判中提出了“加大外国企业在华市场准入、包括允许外企进入保险等金融行业的措施”。不过，美方并不领情，特朗普不仅没有会见刘鹤，还在谈判当天就宣布了对钢铁征收 25%、对铝材征收 10% 关税的决定。刘鹤无功而返。在博鳌讲话和中国释放出大量妥协信息后，美国贸易代表团五月初访华。他们丝毫没有给中国资产阶级面子，美方的谈判要求中包括：两年内减少中美贸易逆差 2000 亿美元；废止“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国立即采取可核查（当然是让美国核查——作者注）的措施停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停止所有报复行动并不会反对和挑战美国对中国在特定领域投资的限制；降低关税并且不会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等。这些条件，尤其是美国自由报复中国而中国不能反抗的羞辱性条款在人民群众中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并未直接答应，美国贸易代表团也提前返回，朝野士气为之一振。然而，刘鹤五月中旬赴美谈判的结果却是，除了侮辱性条款以外，中国原则上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而刘鹤本人和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却把中美共同声明形容为“双赢选择”甚至“共同胜利”。不到十天后，特朗普政府完全无视刘鹤的“双赢”声明，再次宣布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和强化中国在美投资限制。面对完全没把自己当回事的美国政府，中国资产阶级颜面丢尽，人民群众情绪激愤，海外中文论坛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表现嘘声一片。

环球时报删除了自己对此事的报道，只留下了商务部语无伦次的声明：“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2018年6月15日，美国正式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中国资产阶级终于做出一副如梦初醒状，做出对等加税宣告。但是双方加税措施都要到7月生效，而根据各方消息，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又要派出王岐山去美国灭火。至于王岐山能谈出什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今年四月至六月间，中国资产阶级前倨后恭的姿态已经令许多民众对王岐山赴美谈判不抱幻想。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至于具体为何如此，我将在文章第二部分予以解答。

（二）从“中兴”到末路：中兴案与半外围国家企业

在一些左翼人士看来，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有政府背景的高科技工业企业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些“官僚垄断资本”是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它们将绑架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新一轮的列强争霸。不过“贸易战”中中兴的表现恐怕辜负了这些同志的期望。

早在2017年，中兴就因为向伊朗等国出口美国部件而接受了8.9亿美元的罚款。2018年4月16日，可能是受博鳌讲话中“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开放”等措施的鼓舞，美国商务部再次禁止中兴与美国有关的业务。

面对处罚，中兴这位“帝国先锋”又干了些什么呢？4月20日中兴就成立专门委员会学习欧美法规，还必须拿到满分。5月6日，中兴通讯表示已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暂停执行拒绝令。5月9日，中兴就宣布：“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如此引颈受戮的姿态确实辜负了“小粉红”和“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的期望。而更不够“帝国主义”的事情还在后面。6月7日，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协议，缴纳罚款10亿美元，另交4亿美元由第三方托管；30天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并允许美方指派人员进入中兴团队监督执行状况等。

如果说在贸易谈判中，中国没有直接答应侮辱性条款还算有点“帝国气概”的话，这个被中兴一口答应的处罚措施则有浓厚的“辛丑”风味。当时中国答应了每名中国人赔偿列强一两白银（共计4.5亿），今日则是每人赔偿一美元（14亿）；当时清政府处决刚毅、徐桐等主战派，今日中兴管理层大换血；当时列强派兵进入中国监督赔款，今日美国派员监督处罚执行情况。

看来，这个帝国不过是“大清帝国”，这个中兴，充其量也就是“同治中兴”罢了。中兴如此，被称为“民族骄傲”的联想、华为又如何呢？联想自不必说，关于通信标准投票上“外举不避仇”的商业壮举，联合百名资本家向全国舆论宣战的行为和一直以来的“贸工技”路线已经说明了其买办性质，更不必说明显歧视中国消费者的定价标准。华为的“民族性”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任正非2012实验室座谈会纪要》上，这位“中国企业家”的良心是这样看待“帝国争霸”所必需的基础材料行业的：“我们的优势是数据逻辑，就是在软件，电路设计上的数学逻辑……我们在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持续领先的”；在硬件问题上，任总也颇有高见：“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为什么不让日本人，

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实验，把关我们的产品质量”；任总也非常排斥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会阻碍华为战胜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不像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在扶持本土供应商问题上，任总的选择一如既往的高标准：“我们不是扶持而是选择……扶起来的未必不是阿斗……中国遍地都是人，我就把做好的选来干就行了”；任总似乎提前六年预感到了中兴的遭遇，因此提前为不平等条约开脱：“李鸿章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理解这个结论”。

中兴、联想、华为，一个磕头认罪，叩谢天恩；一个“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个“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更谈不上为中国争霸保驾护航。相反，它们却通过国企改制、“公平竞争”、区别定价等方式帮助核心国家榨取中国人民的剩余劳动，这种买办性是典型的半外围国家跨国企业的特征。

（三）丢人丢到家门口：中国地缘政治的溃败

经济上的“帝国先锋”们糜烂至此，中国资产阶级近几年来的地缘政治表现也乏善可陈。

首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对美国无底线的妥协。2015年10月，面对美国宣布美军随时随地可能在中国南海执行任务的挑衅，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香山论坛上表示“即使涉及国家主权，也不轻言动用武力”。果然，2017年7月，美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领海，并驶进岛礁12海里领海线。2018年5月，刘鹤签署中美共同宣言后一周，美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巡洋舰驶入西沙群岛12海里。同时，美国不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面对逐渐升级的挑衅，中国资产阶级是如何回应的呢？2018年6月5日，中国撤走了西沙永兴岛上的红旗-9地空导弹系统，对此中国国防部的解释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无需过度解读”。范副主席的话讲得很明白，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第二，在美国压力下出卖朝鲜。2016年至2017年间，为配合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也发布对朝制裁措施，包括拒绝从朝鲜进口矿物原料，主要是煤炭；禁止对朝鲜出口航空燃油和火箭燃料。同时，中国还威胁朝鲜不再续约《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算不考虑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资产阶级背盟败约的行为也在国际上使中国陷入孤立，尤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传统盟国的对华态度不可能不受影响。同时中国的背叛行为也使得朝鲜方面脱离中国影响，向美国靠拢，2018年6月的“金特会”就事实上将中国排除出了半岛和平进程之外。

第三，花拳绣腿的“一带一路”。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工程过度照顾中国承包商、腐败横行、担心经济主权被侵蚀、无法支付债务以及担心破坏环境等理由纷纷取消或推迟一带一路项目，或要求更改报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截至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连续三年停滞在144亿至148亿美元之间，占总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从未超过15%。在“金特会”美朝取得谈判成果、中国对朝鲜的影响逐渐削弱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在青岛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当着中国领导的面公开宣布拒绝“一带一路”战略。至

此，“一带一路”不仅早丢了里子，现在连面子也都保不住，不知道那些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无限强大的“大棋党”们要如何解释。

此外，中国资产阶级没能阻止印度军队占据中国领土，也没能阻止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从全局到局部，从经济到政治，中国资产阶级执行的是一条彻底的对外妥协投降之路。用汪洋和楼继伟二位先生的话讲：“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这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局“观。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要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必须首先明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去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不平等交换，即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用较多的本国劳动换取较少的外国劳动。即向核心国家无偿输出剩余劳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进贡”。不平等交换的途径主要有如下三个：

较早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核心国家）具有较大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其产品以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交换，而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产品的价值却高于生产价格。因此，核心国家的产品包含价值（无差别人类劳动）较少，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产品包含价值更多。故而国际贸易中核心国家事实上在剥削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剩余劳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

核心国家占有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通过知识产权等方式强化技术和准入制度等的垄断。这种垄断主要被现有国际分工、市场份额、军事和地缘政治霸权等因素所巩固。核心国家由于占有了这些先进的生产资料和垄断了市场份额而占有了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即免费劳动，如专利费和品牌溢价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地主阶级，外围半外围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则类似于租地农场主，核心国家获得的垄断收入则相当于地租。

第三种情况则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劳工组织较弱，环境保护较差，金融市场不完善，跨国公司可以规避诸如工伤赔偿、保险、教育、污染治理、金融监管和部分税收等成本，以低于当地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价格支付工资。这种劳务外包、产业转移和金融投机的本质是剥夺性的原始积累，即以不可持续地压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破坏社会安全网络的方式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

对于外围半外围国家来讲，该国统治阶级对待上述三种途径的态度和政策决定了该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国策。任何强化上述三种途径的政策，都会强化核心国家对本国剩余劳动的榨取，锁定本国外围或半外围地位，这是充当国际资本在华利益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国策；任何对抗上述途径的政策，都会弱化核心国家对本国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尝试突破外围半外围地位，乃至改变世界体系格局。

中国资产阶级走的是哪一条国策呢？开放金融市场，降低准入标准，放任外国资本涌入高利润行业，会促进利润率平均化，为外国资本攫取剩余劳动创造条件，有利于第一途径和第三途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服从美国立法规则，会强化美国在技术和贸易规则上的垄断性，提高美国的垄断租金，有利于第二途径；缴纳罚款和接受惩

罚性关税则是直接鼓励外国资本通过第三条途径来掠夺中国劳动人民，更何况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一切政策都指向强化中国的半外围地位，继续为核心国家提供剩余劳动，绝无挑战美国霸权、搞帝国主义争霸的“僭越”之心。

中国资产阶级为何会走妥协投降的路线呢？这要从世界体系中处在不同地位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两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的特殊国情来讲起。

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享受着外围国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也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如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都是具备一定中端制造业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从外围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低端工业品，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尤其是材料、芯片和机床方面严重依赖核心国家。核心国家需要半外围国家提供的数量庞大（小国做不到）、质量尚可（外围国家做不到）、价格便宜（核心国家做不到）的工业制成品以满足跨国垄断资本家压低本国工人阶级劳动力价格、维持高利润的贪婪欲望。半外围国家则需要核心国家提供军事保护，以提供安全的能源、原材料和制成品交通线，同时维持原料和能源产地秩序稳定。

就中美关系来讲，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廉价工业品是美国资本主义得以一方面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豢养一部分“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据远航一号估算，中国每年免费向美国输出大约 5000 万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中国对美国的劳动净输出为美国垄断资本家带来了高额利润，并与产业转移带来的失业威胁共同作用，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产阶级打败工人阶级的物质力量。美国资产阶级少不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从中东、非洲和南美进口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在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低于 30% 的情况下，维持印度洋石油交通线、维持中东产油国政局稳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至关重要。中国海军显然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军队，就充当了“治安军”和“护镖队”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也需要美国。这是中美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存在平白无故的“争霸”，也不会有毫无利益的妥协。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眼睛一直盯在利润率上，而一方出钱、一方出枪的合作当然比胡乱炫耀肌肉乃至真打起来的“争霸”有利得多。纵观四十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对美关系的表述，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到“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广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再到中美“夫妻关系”。两国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即共同剥削两国无产阶级（主要是中国无产阶级），维持利润率，确保资产阶级统治长治久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

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从外围国家获取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因而半外围国家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例如半外围国家的综合税率总是显著低于核心国家。相比起核心国家，它们的行政效率、社会稳定和镇压能力总是疲弱的。这会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半外围国家政权机关孱弱**。半外围国家无力供养强大的暴力机关，因此其官僚系统，尤其是军警宪特组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就地自给”，即通过灰色手段直接从人民群众攫取资源。这会造成行政机关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腐败化自不必说，半外围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不足以反映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小，又缺乏足够经费建立监督机制，因此权力寻租行为广泛存在，这表现为贪污腐败、吃拿卡要、卖官鬻爵、官商勾结等，例如卡车司机罢工时反映的警察乱罚款现象，就是地方专政机关人员重要的创收渠道；诸侯化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少，内部分配纷争严重，因此不同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会结成派系，这些派系的政治力量表现为对具体官职的控制，其经济基础往往是地方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家，在基层则是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当派系自身巩固，其他派系乃至中央机关无法插手时，就会演变成诸侯式的独立王国。许多地区县委书记乃至村领导一手遮天的现象就是这种“诸侯化”的普遍反映。本世纪初，两广云贵地区自建武装的毒品村，就实质上具备了“中国小車臣”的特点。诸侯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时可以发展到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一般规则的程度。例如薄熙来事件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同属新自由主义阵营，已不存在任何“路线冲突”，但是各派系以“反腐”为名的倾轧烈度反而不断增强。由于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依附性特点，各派系的冲突往往需要核心国家统治阶级来仲裁，这一方面表现在各派系主要人物都有海外产业和存款，以便在派系斗争失败后跑路，如《巴拿马文件》所曝光的那样；另一方面，各派系也以相互曝光对手海外资产为乐事，如2017年的郭文贵事件。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的倾轧以2018年初修宪为标志，达到一个小高潮，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派系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局；对于资产阶级某个小集团来说，其内部倾轧失败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本阶级统治失败的成本。这一方面授人以柄，导致中国资产阶级在与美国的国际纷争中处于极其劣势的地位（如“贸易战”中的无底线妥协）；另一方面某一派系遭难、其余派系看戏的状况也为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破局提供了时间窗口。非正式化则是中国阶级矛盾逐渐尖锐的产物。阶级矛盾越尖锐，无产阶级越有斗争经验和组织性，镇压的成本就越大。据“非新闻”统计，中国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近三万起，每天80起左右，比2014年增加34%。实际数字可能远大于此，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表示，2011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群体性事件高达500起。随着参与过群体性事件的民众数量增多，单位数量军警对群体性事件的威慑能力逐渐减弱。至2015年，甘肃永昌县少女跳楼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示威群众与镇压军警数量已经接近一比一，以至于上级金昌市、周边武威市和兰州军区都不得不抽调军警前来支援。群众斗争性的增强使镇压成为了“劳动密集型”任务，只能以人力对人力。军警数量显然无法满足镇压需要，大举扩充军警队伍成本太高，因此除频繁抽调、疲于奔命外，不得不大量补充协警和临时工，乃至动员地方黑社会穿上制服维持治安。一方面，这些非正规队伍增加了镇压过程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受群体性事件影响的资本家必须要给军警经济报酬才能买到镇压“服务”，镇压成了生意，军警成了私兵。这种非正规化破坏了军警在人民群众中的专业形象，以至于几乎每次军警出动，都会被民众质疑，“你是为谁服务？”。军警的意识形态威慑功能已经烟消云散，在斗争性强的民众眼里，军警与自己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条枪而已。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的发展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速。它降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力、行动力和镇压力，巩固了基层事实上的自治状态，鼓励了地方潜藏着的离心倾向。封建王朝时期“皇权

不下乡”的格局，正在以压倒个别领导人集权意志的必然性发展着。同时，一部分非正式和退役的军警，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甚于与专政机关的联系。可以说，阶级斗争是革命的预备学校，今天的抗议群众、昨天的协警老兵，都是未来革命大军的预备队。

第二，**半外围国家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已占到所有劳动力的60%以上。由于农村产业后备军逐渐减少，城镇净增就业人口已成停滞之势，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和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加强，另一方面斗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围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数量少、比例低，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因而难以组织强大的工人运动。核心国家由于有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也并无广泛迫切的斗争需要。半外围国家的斗争土壤是得天独厚的。由于要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并不具备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的手段，不得不频繁地使用武力镇压。而领教了军警手段的无产阶级斗争，也很快明白了只要斗争成功，“非法”的也是合法的。比如2018年6月的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就不再满足于拉横幅请愿、呼吁统治阶级满足诉求，而是以直接堵塞运输交通线、盘查过路司机、扣押罢工叛徒的方式逼迫资产阶级做出反应。中国无产阶级斗争走在了幻想“议会模式”包打天下的小资知识分子前面，也走在了部分认为“中华帝国蒸蒸日上，无产阶级只能挣扎”的左翼人士前面。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许多青年学生也在思考为何读书也改变不了命运，这构成了小资产阶级中左翼进步思潮的阶级基础。一部分学生则投入了帮扶工农、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例如，2017年底被番禺公安非法拘押和追逃的广工读书会“八青年”，就因为服务工人引起警方的注意。而在解救“八青年”的过程中，各地工农进步群众也广泛参与进来，在“八青年关注团”中的比例显著超过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交流融合，逐渐打破了知识分子“不接地气”、革命群众“不达天听”的分裂局面。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正在朝着行业联动、全国支援、工农学结合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能源危机浮上水面**。如上文提到，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不到30%，同时石油产量正在下跌。由于人民群众反雾霾、反污染的斗争，煤炭的开采使用受到遏制，中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天然气。但是世界石油产地政局恶化，美国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制造了战略真空。伊拉克事实上处在分裂状态，沙特阿拉伯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社会危机，伊朗饱受制裁、社会动荡，委内瑞拉经济也开始崩溃。目前维持世界石油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美国西德克萨斯的页岩油，页岩油的增产几乎构成了2014年以来全球石油增产的全部。但是据预测，美国页岩油产量有较大可能在2022年（即中共二十大的同一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如果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在四年内彻底改变，当油价再度超过每桶150乃至200美元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变为逆差，同时高能源成本会和工人运动一样压迫利润率，加剧经济社会危机。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一系列次要的危机。例如小资产阶级数量增长和工资上涨受阻，即所谓“阶级固化”问题；在为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繁荣”所需要的维持房地产利润和维持房地产行业规模与众多小资所梦想的改善收入房价比之间的“不可能三角”（笔者会另文探讨），即住房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下金融和高融资成本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问题虽不及阶级斗争和能源危机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后

者的爆发会加速前者发展的速度，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势必是一浪接着一浪，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会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走向成熟，并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

综上所述，在半外围的中国，我们有一个色厉内荏、派系倾轧的资产阶级，我们有一个数量庞大、逐渐成熟的无产阶级，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本文的第三部分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唯心史观与“中华帝国主义论”

在讨论“中华帝国主义”的具体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一下它的基本论点。系统论述“中华帝国主义”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红色中国网上转载的“话实”同志的文章《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另一篇是时代先锋网发布的“寒流急”同志的文章《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两篇文章关于“中华帝国主义”基本特点的论述大体一致，即：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由于压低工资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只能通过战争或经济危机的方式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才能消除生产过剩。而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想危机发生在自己头上，因此帝国主义的矛盾只能通过帝国争霸乃至战争才能缓解。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其国有企业集团（即两文所指的官僚资本）是进行争霸的急先锋，中国国有企业与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而且是核大战。按照“寒流急”同志的说法，无产阶级的“再崛起”，依托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和组织性提高的基础上，取得结成工会等合法民主权利。“寒流急”同志强调，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尤其要警惕改良派资产阶级和国企集团对工人的腐蚀作用，尤其要批判“狭隘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感谢“话实”和“寒流急”同志的辛苦劳动，没有他们的两篇文章，我们将不得不从浩如烟海的信息和倾向各异的表述中找出“中华帝国主义”的系统论述。

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在《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中已经对“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争霸战争理论、生态环境危机理论做了批判，在这里就不必赘述。本文主要讨论“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革命前途和方针策略的观点。

（一）阶级斗争理论的三个断层

“寒流急”同志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工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遭受的恶劣待遇，即“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工资被扣，跳槽困难”。当意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时，工人就会团结起来一起抗争。简单地讲，

“寒流急”同志寄予希望的抗争是被逼到死路上的绝地反击，是历朝历代发生过无数遍的“官逼民反”，是防御性和碎片化的放一枪，“恶心一下臭老板”就走的抗争。

“寒流急”同志的斗争理论与“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相适应的。“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话实”同志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尽管“话实”同志三番五次重申自己的危机理论不是“消费不足”，但是其斗争理论的前提条件却精确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的消费品比例过低，不足以实现家庭团聚、体面生活等目标，一句话，难以维持自身和代际劳动力再生产。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历史背景是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产业后备军数量巨大和生产率进步飞速等。只要这些客观条件不变，那么资本家总能找到替代参与斗争工人的手段，要么是物美价廉的机器，要么是同样“物美价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就不会得到显著改观，工人的工资待遇就不会显著提升。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前半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20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

“寒流急”同志自己对这些状况也有所认识，他指出这种“不干了”、“闹一闹”的斗争“不利于建立长久的工人组织”，不利于“长久的罢工”等。但他把原因归结到工人阶级的觉悟不足上。实际上，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工人阶级由于流动性大、可替代性高，并不具备“长久工人组织”和“长久罢工”的经济自持力，这才是这些零打碎敲的阶级斗争难以“长久”的根本原因。在农民工蜂拥入城、国企工人纷纷下岗、国际产业转移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要求工人阶级具备远超过经济自持力的“阶级意识”，展开“长久斗争”，就相当于要求连井冈山都保不住的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一般，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

所以，在如何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上，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寒流急”同志就只能给出从“小事做起”，“照顾细节”，“一人有难，大家帮忙”的“策略”。由于无视当时中国阶级斗争的客观状况，这种互助“策略”能带来的组织力量甚至还不如“法轮功”。由于对当代中国经济危机特点的错误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正确认识当代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因而无法在“闹一闹”的阶级意识和长久扎根的组织能力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一个断层。

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不是“消费不足”。据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介绍，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已经从2010年的约36%下降到2016年的约28%，下降总幅度已经接近九十年代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上升幅度。同时期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也从约23%下降到15%，逐渐接近美国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48.5%上升到53.6%。不是工人阶级太弱了，弱到活不下去只能绝地反击，而是工人阶级开始强大了，并且初步强大到可以压迫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强大到使消费品成为社会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这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自然会呈现出与“消费不足”不同的态势。首先，由于产业后备军萎缩，资产阶级在工资待遇谈判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都在上升；第二，由于工人阶级获得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越来越高，工人阶级积累了大量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第三，沿海工资上升的趋势迫使大量资本家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内陆，把工厂

建到了工人家门口，而本省本地的工人在社会关系网络、经济自持力等方面要远强于流动到外省的工人，这为“长久”的“组织”和“罢工”提供了广阔的根据地和后方，从而增强了工人的斗争力量；第四，正如笔者在第二部分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特点时所说明的，由于内地地方政府掌握的经济剩余明显少于沿海，因此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程度更深，力量更加薄弱，反应更迟缓，基层镇压力量消极怠工更严重，对派系纷争更忌惮，镇压手段更加非正式且不可控。一旦镇压开始，有可能引发当地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因而内地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弱的。综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工人阶级强了，资产阶级弱了，又使工人阶级可以在自己的桑梓故地，迎战不是那么强大的统治机关，中国工人运动在此刻才取得了在某些具体环境下的“强弱易势”，才能“一闹再闹”，才能承受局部的失败和走向胜利。

“寒流急”同志认为，“独立于资本”的工会是工人斗争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也是解决工人斗争持久力不足、提高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固定组织。独立工会建设的初期目标之一是通过“非法”斗争取得合法地位，并取得一般意义上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寒流急”同志对合法工会的向往来源于工会在历史上的核心国家阶级斗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的确，核心诸国的工会在劳资集体谈判、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中曾经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作为阶级妥协工具存在的，其合法存在并发挥支持劳工作用的条件是劳资双方力量大体对等、生产力发展迅速、外围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提供了足够阶级妥协空间，这大体上对应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五十至七十年代大政府资本主义时期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资本家时，工会就是事实上的政权机关，对工人几乎没有吸引力，这大体对应着美国八十年代以后和中国九十年代以后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工人时，则工会就是事实上的革命组织。处在半外围的中国，由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需要贡献给核心国家，统治阶级不会允许独立于自身的劳资集体谈判机构出现，因而阶级妥协的空间并不存在。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天让独立工会合法，同时开放言论和结社自由，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其无法阻止事实上的工人革命组织出现，也无法管制言论和结社自由。革命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不仅工会组织合法和非法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孵化革命政党而存在的工会本身也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事物了。由于对半外围国家阶级妥协空间和阶级斗争的条件缺乏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将包括合法工会在内的一系列合法权利与未来中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具体阶段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二个断层。

事实上，只有那些缺乏现实斗争经验、乖宝宝当习惯了的左翼知识分子才会对合法不合法、工会不工会的形式问题过分深究。在半外围的中国，在官僚机构普遍“非正式化”的条件下，面对“说你违法就违法”的腐败官僚，一般革命群众早已不认为资产阶级政权授予的“合法地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2018年6月漯河老兵的斗争中，老兵们在没有向任何有关部门报备注册的情况下聚集抗议，显然非法；警方围困老兵并切断信号，拒不释放被殴打扣押的军嫂，也属非法。最终中央迫于压力派员处理此事，答应了老兵们包括惩办责任人、释放军嫂等条件，老兵们在达到斗争目的之后也有组织地撤退。深处斗争前线的革命群众，早已在斗争中学习了辩证法，不再追求务虚名而处实祸的“合法性”或“组织形式”，而是务实地

利用专政机关的弱点，实现重点突破，夺取阶段性胜利。

关于政权问题，“寒流急”同志特别指出，未来阶级斗争不应当指望在“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但是他立刻就转到批判一些同志“抬举薄熙来那样的某些精英”的问题上，直到文章结束也没有正面回答，假设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甚至是合法工会的无产阶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能不通过“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来取得政权的问题。这暴露了“寒流急”同志理论的第三个断层：由于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矛盾缺乏认识，无法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可能的发展中得出革命胜利的可能道路，即无法回答资产阶级如何由盛而衰，最后丢失政权，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最后取得政权的问题。在讲完无产阶级意识大发展和工会合法化后，“寒流急”同志遇到了一堵高墙。在高墙的这边，站着“寒流急”同志和他的合法工会，在高墙的那边，资产阶级政权依然耸立着。“寒流急”同志想必已经发现，他所设计的中国工人的“崛起之路”最多只能把我们导向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水平，而对如何打穿这堵墙、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却束手无策。在提不出任何砸墙战略的时候，“寒流急”同志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一面批判薄熙来和“左转派”，一面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最后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流收尾。

然而，在“寒流急”同志的论述中，我们除了看到他强调工人应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忙”，革命者要“注意团结，光明正大”，知识分子要有“工人立场，结合群众”这些主观能动性之外，看不到任何“不可遏制”的历史必然性。仿佛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革命就能胜利一样。“寒流急”同志特别推崇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和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却忽略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是为了在白色政权的缝隙中寻找红色政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也忽略了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为了寻找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两位革命领袖的理论是相通的，即在整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局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强弱转换；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现实斗争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去发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分析、可操作的革命战略。相反，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任何关于“历史大潮流”的论断都注定沦为失败主义的温床，沦为在漆黑长夜里的胡乱放枪壮胆。

“中华帝国主义论”做不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做到。从全局看，只要产业后备军逐渐萎缩的趋势不变，中国工人阶级的谈判力和斗争力就会不断增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历史趋势就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发生重大逆转，世界石油产量无法满足需要，飙升的油价就会以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为代价使得大量剩余价值流入石油生产国；只要中国产出资本比不迅速上升，即生产率没有重大跃升，同时中国还在以不平等交换每年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价值，中国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总趋势就不会改变。利润率下降一方面意味着投资动机消失，从而进一步引发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意味着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减少，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再生产的重要事业单位，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乃至军警宪特都有可能发不出工资，因而加速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进程，从而显著弱化武力镇压和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如各地教师、老兵、保安、城管和护士的罢工维权运动）。

从局部看，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内地，由于没有收买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

无产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镇压都会以更加直接、暴力且非法的面目出现。当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到一定程度，现有军警力量会不堪使用，而军警的“付费”镇压服务也加大了镇压成本，从而无法在第一时间阻止事态扩大。最终会出现统治阶级放弃一部分与统治阶级当权派系关系不大的地方资本集团（可能以黑社会形式存在），任其被群众力量淹没，乃至默认一些基层政权事实上自治状态的局面。同时，与当权集团矛盾较深的、独立性较大的部分地方集团也事实上处在半自治状态。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形式上的宗主地位，在地方和基层则出现反动的、改良的和进步的政权实质上独立和犬牙交错的状态。只要资产阶级无法改变全局上的不利因素，无法阻止利润率下降和崩溃，反动的和改良的政权就无法控制积累危机，导致工农群众乃至一部分资本家投向进步政权这一边。进步政权一方面应当采取积极的经济措施，脱离世界资本主义分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另一方面则在经济制裁、政治打压、局部武装冲突以及和各地资产阶级政权的合纵连横中训练干部队伍。当发生全国性的强弱易势时，进步政权既有群众基础，又有斗争经验，同时掌握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权，有人有钱有枪。到那个时候，取得全国政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现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赖“若干地区的局部胜利”，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造反。”这不仅是对上一次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也为下一次中国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二）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

“寒流急”同志和“话实”同志对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颇为反感。从杜绝右倾机会主义、实现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来看，我们当然要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单纯改良思想。但是，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

在“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看来，以薄熙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会从经济上腐蚀工人的国有企业是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危险的敌人。与其阶级斗争理论一样，他们的论断同样是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相适应的。由于工资被压制，所以只要资产阶级用改良措施分给工人一部分消费品，资产阶级就可以解决工人反抗和生产过剩两个危机。为了堵住资产阶级一箭双雕的方案，“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改良派和国有企业的攻击一直居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但如果这真是个好方案，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早点使用呢？“中华帝国主义”论者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利润挤压”的角度来看，一切就明朗了。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压低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率，因而任何改良方案，尽管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有效需求缓和阶级矛盾，但根本上讲只能加剧而不是缓解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壮大而不是减损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薄熙来集团被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其他集团消灭了。这并非“寒流急”等同志的功劳，而是利润率的要求。而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支持薄熙来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而不为？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小资产阶级数量的膨胀和收入的上升。要维持民族主义作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继续扩大小

资队伍、提高小资收入就是必要的条件。在利润挤压的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自己给出的“中国梦”可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面对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就业、要加薪、要住房的诉求，人民日报都不得不给“中国梦”降温，指责年轻人要求太多，缺乏“历史耐心”。民族主义的诉求本质上是消费主义的诉求，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满足的。一部分小资群众民族主义的梦幻会在面对就业市场或看到房价上一眼望不到边的“0”时灰飞烟灭。而包括“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在内的青年左翼，面对的多是尚未尝到剥削滋味的大学生，等他们毕业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会迅速明白：这“厉害了”的玩意，可从来不是“我”的国。

（三）阶级斗争的两条道路

分析了“中华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后，两条清晰的阶级斗争道路摆在我们面前。

一条道路是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然是由于资产阶级强大和无产阶级弱小，所以经济危机必然是无产阶级工资被压制导致的“消费不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只能依靠被逼到墙角的“绝地反击”。为了克服在“消费不足”剧本里实际无法克服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困难，就不得不将组织固定下来，结成工会；为了保护组织的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政权问题面前徘徊彷徨起来，既不愿从地方胜利做起，又不知道如何直接取得全国政权。最终，只能表达一下对“左转派”和民族主义的义愤。如果“寒流急”同志真的要谈到全国政权问题的话，他的论点可能也超不出**再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至于革命形势如何与革命前景联系起来，似乎是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此种道路的三个不可逾越的断层，每遇到一个断层，“寒流急”同志就拿出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来试图跳跃，结果就是从“闹一闹”一路跳到了他自己也没有说明白（甚至于恐怕自己也不相信的）“工人阶级崛起”。

在唯心史观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可以创造可能，能动性可以保持组织，能动性可以从无比强大的“中华帝国”一跃进入合法工会乃至全国胜利的天堂。这条道路的基调是，敌人强大强大太强大，我们动员动员再动员。至于弱小的我们如何打败强大的敌人，他们是不考虑的。他们把历史上一切的失败都归纳为动员不足、组织不力，思想上没有克服资产阶级影响等等。一方面，“寒流急”同志在文章里反复强调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要革命力量的增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只是无产阶级动员的成就，那么，依靠个人魅力动员工农的“领袖人物”就不得不扮演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的胜利就只能被理解为领袖动员有方的结果，个人英雄主义和小“张国焘”们也会一天天地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高估，一部分左翼人士才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过分重视，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又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所想象的种种所谓“阶级正义”。所以，才会有人说“利润挤压”是把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向了无产阶级；所以，才会有人觉得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特定的改良集团是投降；所以，才会有人比资产阶级还害怕“天下大乱”。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对经济危机

的正确理解，不得不放弃暴露和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策略；不得不放弃认识并自觉掌握造成“大乱”的客观历史规律。闭目塞听，自缚手脚，自认清高。按照这样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都是不可能找到前途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唯物史观看来，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资产阶级的强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也必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弱的可以变强，小的可以变大，原来弱小的可以打败原来强大的。

这种转化的条件来自于半外围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和特殊的矛盾。半外围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组织力不断增强、觉悟不断提高的中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和谋求内部的妥协；后者又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从而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外强中干的本质。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无法阻止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因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造成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无法阻止自己的统治机关日益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因为它无力也无心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条件下的种种困境。这两种趋势发展下去，两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必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弱小的就可以变为强大，原来貌似强大的其腐朽虚弱的本质将暴露无遗，各中间阶级的立场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条件变化的过程超越一定的点以后，量变就会转化为质变，历史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历史的必然性。

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与唯心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作用不是“创造可能”，而是“实现必然”。中国革命的到来不是一片漆黑乌云压境之时的祥瑞天降，而是历史浪潮滚滚向前中的百川入海。

参考资料：

时代先锋网：《联想已成过街老鼠，华为就是“民族自豪”？》，《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石油峰值桶”网：<http://peakoilbarrel.com/>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人民日报：《年轻人需多些历史耐心，别丧失拼搏勇气》

红色中国网：《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红色经济参考》系列文章

不要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 给某青年同志的一封信 (2018年6月26日)

远航一号

某同志，

你们的杂志，我个人已经读过，初步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 鉴于国内实际情况，建议你们不公开以某学社名义活动，也不要搞纲领、委员会等，不如另外采用某种非政治性的、联谊性的名义，有利于长远。

(二) 关于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其中当然有不同集团，但其相互之间的差别，不是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内部的差别。但总的来说都是革命对象。至于其中是否有应当策略性地加以利用的部分，要取决于未来政治形势。

(三) 不要幻想中国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部分会赞成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即其半外围的、依赖廉价劳动力剥削的积累模式）。所以不要相信个别资产阶级人物什么普世价值的鬼话。从实际政治来说，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不在于资产阶级说什么，也不在于资产阶级有什么样的法律，而是取决于现时现地的阶级力量对比。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是实际的问题，有干部、财政、武装才有政权，否则即无政权，也无所谓民主。即使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也要符合这一一般规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存在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等大量实际问题。所以，就中国来说，即使是为了实现一般民主自由，也只有无产阶级力量相当强大时才可能；而无产阶级力量果然相当强大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不了的。

(三) 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占统治地位；不是半资本主义或过渡状态，这种过渡至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只能是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也是中国目前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处于统治地位。

（四）不要高估国有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中国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长期趋于下降，已经显著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国有资本的比例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主要或关键方面。

（五）关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目前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就是说，它对外围国家处于剥削地位（攫取其剩余劳动），对于核心国家处于被剥削地位（输出剩余劳动）。平均来说，中国目前对核心国家输出的剩余劳动仍然显著多于从外围国家攫取的剩余劳动

（六）不要机械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种革命理论，它的作用，不在于从中寻找一些表面上似乎与我们周围的经济、社会现象相似的方面，如垄断、集中、资本输出等，而在于它能够切实回答我们当前阶级斗争中的实际问题，能够切实抓住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表面的、形式上的谈矛盾，而是能够实际回答资产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条件，无产阶级发展赖以发生的条件，能够回答，无产阶级如何能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如何能由强转弱，直至回答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的问题。就像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那样，能够准确全面地认识到敌我两方的强弱优劣，并且正确地分析对方的优势为什么是暂时的、可以削弱的，我方的劣势为什么也是暂时的、可以转化为优势的。目前在部分青年同志中流行的形形色色的“中华帝国主义论”都不能回答上述问题，因而在我们看来，都是表面上激进，而实际上掩盖部分左翼青年畏惧资产阶级“强大”、看不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失败主义

（七）关于阶级分析，要从生产关系入手，首先掌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特点，然后掌握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和特殊的特点，然后了解各个社会集团在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然后来判断某个社会集团是什么阶级、属于什么阶级；而不是单纯地将各种表面的经济、政治、社会现象随意地堆积在一起。

（八）“井冈山卫士”的文章不是我写的；但我和另外一些同志赞成其中的大部分观点。

话实同志的“帝国主义论”——兼评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 (2018年7月4日)

远航一号

话实先生的数万言长文“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发表在激流网上。在这篇长文中，话实先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判了他所理解的（或者他所歪曲的）世界体系理论，并且用了不少的篇幅批判了远航一号等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关于中国前途的一些观点。

在话实先生看来，中国资本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事实，而中国资本中最大的集团便是国有垄断资本集团，这个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集金融和工业资本为一体的，垄断性最高的，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单一资本集团”。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在扩张中必然要与美帝国主义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进而展开争霸斗争。面对着这样的中国资本集团越来越强大的“事实”，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可以做些什么呢？话实先生的口号很响亮：“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中国的资本集团确如话实先生所说的非常强大，并且正在成长为霸权，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对这种霸权的客观基础又在哪里呢？话实先生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这种霸权的动力又在哪里呢？既然在历史上英国的无产阶级、美国的无产阶级、德国的无产阶级、日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些国家争霸的过程中或夺取霸权以后都不曾反对霸权，或者局部反对而后失败，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霸权呢？为了将来的壮烈的失败？

表面上，话实先生声嘶力竭地批判民族主义，但是话实先生对于中国与世界实际状况的认识有哪一个重大的方面，是区别于“工业党”、“强国派”分子的呢？两方面都认为中国资本集团空前强大、越来越强大，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必然要对外扩张，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必然要与美国争霸并有可能夺得霸权。话实先生文章的“受众”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话实先生冗长晦涩的文字，劳动者是看不了的），“工业党”、“强国派”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群众。那么，在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中，话实先生除了他自己认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感以外，还有哪些优势呢？话实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能当饭吃吗？

所以说，话实先生数万言长文的营养 = 零。

不过，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话实先生的长文也并非一无用处。话实先生的诸多错误，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目前的一批小资产阶级左派积极分子中相当流行的。这些错误观点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阶级斗争当前阶

段特点的反映。透过这些迷雾，我们才能看到那隧道尽头的光明，识别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

帝国主义和战争

既然说到帝国主义，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在列宁看来，十九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为了攫取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而大量输出资本。这种资本输出为垄断资本家带来了“超额利润”，并且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了“工人贵族”，这些“工人贵族”事实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请话实先生注意，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占有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培养的“马列主义研究者”的发明，而是列宁的观点。虽然列宁当时仅仅提到了“工人贵族”，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多数被改良主义夺取了领导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当时恩格斯在通信中已经提出过整个的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问题。全世界无产阶级当然要联合起来，但是不是通过否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客观上占有了一部分世界剩余价值这一世界历史事实。

列宁并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获得资本输出的场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瓜分世界，并将广大的亚非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或曰资本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必然要为了瓜分世界而展开斗争；又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当这种要求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就必然爆发战争。

如话实先生所承认的，自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以来，世界历史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也没有爆发过战争。如远航一号在另外的文章所说明的，近年来，战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举全国之力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更不必说主要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头号霸权国家与若干中小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在这些战争中经常被当地人民群众所打败）。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大可能将对外战争作为实现本阶级利益的一个主要手段。

话实先生承认不承认这一新的历史现实呢？他是坚决不承认的，但是又好像羞羞答答地要承认。

话实先生用了一大段篇幅引用了远航一号的一段论述，其中说：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然后，话实先生故作惊诧状：“人们不禁会问这个作者来自哪个星球？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看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看不到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竞争、垄断、霸权！”

姑且不论，中美两国资本集团之间到底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请话实先生回答，远航一号的上述论断是否符合近年来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是否很有可能也符合可预见将来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

对此，话实先生先是以小粉红般的热情、《环球时报》般的政治正确为中国的崛起而惊叹：“军舰‘下饺子’式的快速增长，航母、航天和其他军备的投入，海外多个基地和租界的筹建，‘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投行的成立、大规模的南海种岛，这一切都表示着他挑战美帝霸权的能力和胆量都在增强，更何况他的意愿。”

咱们姑且就把这些赔本赚吆喝都当作是对美帝的挑战吧。但是我们知道，话实先生所追求的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不是中国霸权。那么，话实先生接下来的结论就不能不令人沮丧了：“是的，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直接的冲突不易发生，但是像南苏丹、缅甸等地的替代战争，越演越烈的航天、航海等的军备竞赛，捍卫各自所谓‘核心利益’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会连绵不断。”就是说，无论争夺如何“连绵不断”，南苏丹、缅甸有哪些内战（是否“替代战争”另当别论），军备竞赛如何热闹，中、美之间终究是“不易发生”直接冲突的。

既然如此，话实先生，你费了那样大的力气，批判了几个理论体系，除了得到事实上与“小粉红”们完全一致的中国强大论，又在事实上承认了远航一号关于“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论断以外，还剩下哪些有那么一丁点用处的东西？

相比之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绝不仅仅是为了论证帝国主义争霸，而是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将使得“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从而造成“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条件。

而在话实先生的洋洋洒洒中，帝国主义链条处处强大，无产阶级除了正义的词汇不剩下任何实际的力量。话实先生，你是在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写作，还是在为论证帝国主义坚不可摧而写作呢？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如话实先生所说，世界体系学说确有不同的门派，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这也并不否认，这些门派相互之间仍然有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但是，像话实先生那样来概括世界体系学说基本观点的倒是真正的别处心裁：“当前替代列宁主义分析框架的最时髦的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版，即世界体系论。”“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也看成类似有机体一样的超越国家的‘体系’，那么，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世界体系论一边谴责‘中心’国家对‘外围’的掠夺，一边却在为美帝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依据。”“这里牵扯到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帝国之间的对立性。‘世界体系论’在哲学上就是60年代批判过了的‘合二而一’论的现代版。”

话实先生的逻辑理解能力真是妙不可言。世界体系理论家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霸权在客观上起了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共同利益并促进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作用。而在话实先生看来，这就是认为“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照此逻辑，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起着进步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合理的”了？

按照话实先生的见解，美国霸权就只能是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而绝不可能是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照此逻辑，不妨说，任何一个资本家都只有他的个人利益，而决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乃至任何一个阶级的个人都只有他的个人利益，而绝不可能有阶级意识。话实先生，你的这种国际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呢，还是资产阶级“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论？

话实先生说，世界体系论维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恰恰相反，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是目前世界上著名社会科学家中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已经造成其“结构性危机”并必然导致其灭亡的少数几人之一。沃勒斯坦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而话实先生事实上所主张的帝国主义越来越强大的观点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资本主义危机

话实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混乱。

在话实先生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生产过剩，其他一切危机理论都是错误的。

有一定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知道，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如果说，一切经济危机都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从而只要消除生产过剩，便能消除经济危机，这并不比医生说一切疾病都是感冒发烧引起的高明多少。就经济思想史来说，这无非是抄袭马尔萨斯和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学说而已。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必然意味着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能够通过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支出以及资本家的消费支出而得到实现。那么，资本家为什么不愿意维持（或扩大）投资支出的规模呢？显然，这个原因，只能从生产过剩以外去寻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必然产生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引起积累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进而导致积累危机的历史现象。对此，话实先生向来是视而不见的。

那么，对于马克思的著名的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话实先生又为什么完全回避呢？（除了提到不平等交换可以部分抵消利润率下降，但在探讨经济危机时则完全忽略）

大多数主张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主因的理论家，都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所导致的工人阶级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话实先生又很自信地摒弃了消费不足危机说。

按照话实先生的独特而别致的生产过剩危机说，危机只能由生产过剩产生，因而一切看似可以消除生产过剩的变化，包括技术革新、商品输出，乃至战争和自然灾害都可以消除生产过剩。

话实先生认为，战争和自然灾害可以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减少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就没有了，这就是消除生产过剩。

话实先生，你能不能向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相对于需求的过剩吗还是别的什么过剩？如果是相对于需求过剩，那么有哪一种经济理论告诉你，当你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的时候，需求是可以不受影响、固定不变的？你消灭了一部分生产能力（不是闲置，是消灭），收入或者财富不会减少吗，需求不会下降吗？

确实，历史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消灭了生产能力，而是因为战争期间政府军事开支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得原有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动员（像美国这样本土没有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国家生产能力还大大增长）。

资本主义和全球生态危机

无论如何，按照话实先生的观点，既然经济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那么几乎任何社会和经济变迁都可以消除生产过剩，进而克服经济危机。既然如此，经济危机除了充当资本主义定期的健康检查以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资本主义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于是垄断资本便征服海外市场，经济危机就克服了。垄断资本要征服海外市场，相互之间当然会发生冲突，于是主要帝国

主义国家相互之间要争霸。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有核武器，所以争霸也不会导致战争。那么好了，争霸的结果，无非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强大，无产阶级越来越受压迫而毫无办法，资本主义天下永远太平。这便是话实先生混乱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果。

话实先生不仅认为经济危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并且认为生态危机更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按照他的生产过剩唯一危机说，生态危机因为会促进环境保护投资，还会帮助克服生产过剩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关系，近年来，《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多有著述。福斯特明确认为，疯狂的、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已经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结果，将颠覆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人类已经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历史关头。

话实先生对于《每月评论》是熟悉的。我建议，话实先生将自己关于生态危机无关紧要论的观点发表在《每月评论》上，一定会引起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视。

话实先生与小资产阶级左派

让我们看看话实先生的长篇巨著最后得出怎样的结论吧：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他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会做垂死的挣扎。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退，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美国人民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是美国人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只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那样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而非帝国之间的争霸才会促进美国人民的觉醒。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口号的背后呢？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美帝国主义有核武器，“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所以，在美国人民“觉醒”之前，一切、一切，都无从谈起。至于美国人民什么时候“觉醒”，这是一个类似于植物人何时苏醒的问题。

这是话实先生长期以来失败主义思想的总暴露。这种失败主义，并不是话实先生个人的，而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左派积极分子所共有的。

近年来，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除了社会主义时代的老革命、老工人长期坚持斗争以外，大量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在向马列主义左派靠拢。这些新加入左派队伍的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或者出身小资产阶级，或者在事实上拥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大批小资产阶级被排斥在优质劳动力市场以外，出现了边缘化、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政治激进化的客观社会基础。但是，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们的思想左倾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个人前途的悲观失望以及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廉价同情。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资本到处都很强大，而劳动解放只能是遥遥无期。

他们不懂得，任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定的社会是依赖于一定条件的，而一定社会的发展往往会破坏它自己赖以存在的条件。他们不懂得，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小的可以变成大的，弱的可以变成强的。在他们看来，现在强大的便只能永远强大下去，现在弱小的便只能永远弱小下去。未来的世界，工人阶级只能是配角，资本和帝国才是主角。

他们不认真学习伟大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不重视中国劳动群众自己的斗争传统，而对外国一些屡败屡战的“经验”却津津乐道。他们不努力学习整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以及世界上最新的进步和革命思想，而是将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局部经验奉为不可颠覆的教条，用最革命的口号来掩饰自己最低落的信心。

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如果不摆脱这种被小资产阶级左派统治的状况，是必然不能够进步的。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也必然能够摆脱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使得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代表。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兼答“太平洋的风”同志的质疑 (2018年7月17日)

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

井冈山卫士“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和“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两文发表后，已经在马列毛左派同志中引起了热烈的和积极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同志正在认识到“中帝论”的危害，并且开始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不应该机械照搬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若干具体观点，而必须结合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

近日，红色中国公众号转载了井冈山卫士的后一篇文章（标题略有修改）。“太平洋的风”同志读后在《无产者评论》上发表了短评（“太平洋的风”同志误以为原文作者是“造二代”）。“太平洋的风”同志表示自己是“中帝论的支持者”，同时也表示“对于红色中国的观点，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些严肃的对话。所谓严肃，就是不能歪曲对方的观点，并且基于事实和逻辑来进行讨论”。我们赞赏“太平洋的风”同志所表达的这一讨论态度。

“太平洋的风”同志对于井冈山卫士原文中所计算的中国工业企业集中度的一些指标提出了批评，指出如果采用全部工业企业而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 据，则中国工业企业的集中度并不低于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工业企业的集中度。我们对“太平洋的风”所给出的数据和数据来源做了核对，确认“太平洋的风”同志计算无误，“太平洋的风”同志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是正确的。我们在此，对于“太平洋的风”同志指出我们的数据引用不当表示感谢。

不过，我们还是想借此机会与“太平洋的风”同志和其他同志进一步探讨如何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如何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列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阶级斗争具体实践的问题。

确如“太平洋的风”同志所说，在列宁看来，现代帝国主义（或曰资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指出过，“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第411页、第434页）。垄断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聚和集中的产物，但积聚和集中本身并不等同于垄断。如果没有这种差别，就无法区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也无法区别马克思《资本论》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列宁《帝国主义论》时代的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此有所说明：“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

议；... 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第 333 页）可见，在列宁看来，集中本身并不等同于垄断，而只是造成了垄断的条件。这里要说明的是，井冈山卫士在原文中由于行文仓促疏忽，也没有注意区别集中和垄断，这是应该更正的地方。

那么，什么是垄断呢？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和媒体提供的一些资料，列宁介绍了垄断组织的一些基本特点，那就是，一个或几个行业的若干最大的资本家用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形式组成“资本家同盟”，对市场的容量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来瓜分市场、规定产品产量、确定价格等。通过这些垄断行为，一个或几个行业的最大资本家可以大大压低原料的价格、提高售出产品的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垄断形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竞争性资本主义企业受到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压迫和统治：“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 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第 342 页）

列宁还引用资产阶级商业资料来说明当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高额利润。以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煤油托拉斯）为例，其 1900 年的注册资本为 1.5 亿美元，而 1882-1907 年的年平均纯利约为 3400 万美元；年平均纯利相当于注册资本的 23%。1900-1907 年，该公司平均每年向优先股持有者支付高达 43% 的股息。

美国苹果公司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垄断企业之一。据苹果公司财务指标，在截至 2017 年 9 月底的财政年度，苹果公司的税后净资产收益率高达 37%，净利润占营业收入的 21%。

相比之下，再来看一下在很多“中帝论”者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主流媒体看来是中国垄断企业代表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石油”）。据 2017 年中石油财务报表，该年度中石油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 1.9%，销售净利润率仅为 1.8%。

再来看 2016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这一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未扣除所得税）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约为 22%、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 6%；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约为 1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 7%；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不到 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仅为 5%。

可见，在一些“中帝论”者看来，所谓“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中国国有资本集团（话实，“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崛起”）不仅没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也谈不上“扼杀”和“压迫”私营中小企业，反而仅能得到显著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这些都说明，简单地认定中国现在

的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进而认为中国的国有资本是当代垄断资本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部分，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确实存在着垄断企业，特别是在某些所谓高技术产业中，外资控制的一些企业确实得到了高额垄断利润。井冈山卫士在以往的一些文章中对此已经做过介绍。但是，被外资控制或者被外国资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显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而更像是列宁所说的被帝国主义剥削的“附庸国”的特征。

我们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是为了单纯的经院学术的目的，而是为了服务于实际的阶级斗争。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所说明的，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首先是为了说明当时还在进行的帝国主义大战的真实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性质。为此，列宁努力研究了当时“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更重要的，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是为了与当时已经形成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展开斗争并且分析和认识修正主义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列宁指出：

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 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 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 80-100 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第 329-330 页）

我们请“太平洋的风”同志和所有目前仍然信奉“中帝论”的同志特别注意列宁的这一句教导：“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列宁这里所讲的“这个现象”就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而这一现象的“经济根源”就是作为帝国主义主要特征的寄生性、腐朽性；这种寄

生性尤其表现在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剥削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上。列宁特别说明，因为这种超额利润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所以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乃至培养整个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后来的世界历史的事实也证明，改良主义在后来的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都占了统治地位。

“太平洋的风“同志、《无产者评论》的读者同志们、红旗网的读者同志们、激流网的读者同志们，你们赞成还是不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呢？如果你们不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认为你们确实赞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愿意将其应用于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呢？

如果你们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并且你们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你们又怎能否认你们上述观点的必然推论：即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良；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于连这样的改良也未必能够得到。

显然，在中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中帝论”是不可能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胜利指明前途的。如果还有前途的话，恐怕也不过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的前途。

我们不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未来能够得到的仅仅是“一碗红豆汤”。我们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像历史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斗争一样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可以通过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的、特殊的矛盾来加以认识的。在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外围国家；这种半外围的地位，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从而也就没有培养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国是一个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并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壮大和组织准备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日益增长的斗争能力和要求必然要超越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够容纳的范围。这些，在我们看来，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必然要走上革命道路并且突破资本主义狭隘界限的基本历史依据。

“中帝论”的同志们，据说你们是不赞同我们的上述分析的。那么，请问，你们是否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必然要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取得胜利的呢？如果你们相信，能不能把你们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据和道理讲一讲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如果你们不相信中国

的无产阶级可以强大起来，不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取得胜利，你们也不妨将你们的真实的信仰宣告出来。那样，你们至少不失为诚实的人。

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 (2018年7月22日)

远航一号

归根结底，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还是属于世界的“西方”？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们，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最终可以胜利呢？相信还是不相信“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呢？

井冈山卫士同志“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发表后，许多同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意见。其中有些，是严肃的、有益的批评意见，如“太平洋的风”同志“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一文；对于其中的一些疑问和误解，我们已经做了答复。还有一些，却是不严肃、不认真的，他们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认清事实、追求真理，而更多地是为了让真理服从自己。对于这些不严肃、不认真、有害而无益的批评，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和毛经天同志也分别做了答复。

激流网是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进步网站；长期以来，红色中国网与激流网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直是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以往一些批评我们的文章，激流网转载了，但并没有首发。我们对于“中帝论”的批判文章，激流网并没有转载过。对此，我们是理解的。这次，壮壮同志批评我们的文章，则是由激流网首发的。想必，激流网编辑部的同志对于壮壮同志的文章是完全赞成的，而对于我们对“中帝论”的批判则不完全赞成。如果确实如此，建议激流网的同志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将你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壮壮同志的批评文章题为“井冈山卫士知道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吗？”。壮壮同志的主要观点是，中国银行业的“垄断”程度已经高于二十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的垄断程度，因而足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帝国主义特征。井冈山卫士同志这两天比较忙，受井冈山卫士同志的委托，我来答复壮壮同志提出的质问。

壮壮同志查阅了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报》，了解到：“2015 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 4262 家。根据普华永道 2017 年 4 月给出的《银行业快讯》中的编写说明，27 家上市银行的资产合计相当于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 76.40%。”根据这个信息，壮壮网友认为中国商业银行总数大致为 4000 家，27 家上市银行占商业银行总数的不足 0.7%，却占到了全部资产或存款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个集中

程度，按照壮壮同志的计算超过了德国银行业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集中度（占银行总数约 0.75% 的 9 家大银行占有全部存款的一半）。

壮壮同志能够主动做调查研究，查阅银监会资料，这是好的。但是，壮壮同志的调查研究不够仔细，下结论又过于匆忙马虎，以至于忽略混淆了一些金融业的基本概念。在 2015 年底，中国确实有 4261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这比壮壮同志列出的数字少一家，这一微小差别无伤大雅）。但是，壮壮同志，“金融机构”不等于“商业银行”。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6 年中国银行业各种金融机构数量盘点”，2015 年底，在总计 4261 家金融机构中，计有农村信用社 1373 家、村镇银行 1311 家、农村商业银行 859 家、城市商业银行 133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12 家、民营银行 5 家、大型商业银行 5 家。此外另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邮政储蓄银行、货币经纪公司、贷款公司、政策性银行等等，均非商业银行

（<http://www.askci.com/news/finance/20160902/14383359164.shtml>）。

如将其中确属商业银行的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相加，总数不过 1014 家。如此算来，中国最大 27 家银行占商业银行的总数就不是壮壮同志所认为的不足 0.7%，而是 2.7% 了，其集中度也就未必高于二十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度了。在“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中，井冈山卫士在说明中国工业的集中度时，研究不够仔细，仅研究了少数大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例，而没有研究大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例。“太平洋的风”同志指出了这一错误。令人遗憾的是，壮壮同志没有从井冈山卫士同志的这一错误中吸取教训，在没有搞清楚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两者之间区别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得出“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实在是太恐怖了”的结论，犯了与井冈山卫士同志类似的错误。所以在我们看来，壮壮同志应该向“太平洋的风”同志学习，学习他严肃、认真的讨论作风，努力做到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而不要马马虎虎、不求甚解。就像毛主席说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行的。

在与“太平洋的风”同志的探讨文章中，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资本积聚和集中只是造成垄断的条件，但是集中本身并等于垄断。关于集中和垄断的区别以及垄断的标准，除了可以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外，我和井冈山卫士同志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做了进一步说明。

仅仅就集中来说，正如马克思、列宁都曾经论述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所以，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不仅一些公认的、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一般的外围、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行业的资本都达到了高度集中。但是，银行业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情况。比如，在林毅夫、章奇、刘明兴合著的“银行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发表于《世界经济》杂志 2003 年第 1 期，第 3-21 页），表 2.1 列举了

四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 1989-1996 年银行业资本集中的情况。按照各个国家 5 家最大银行占银行全部资产比例来计算，埃及的 5 家最大银行占该国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为 73%，希腊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91%，印度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51%，肯尼亚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72%，巴基斯坦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90%，秘鲁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76%，菲律宾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56%，津巴布韦的 5 家最大银行占 97%。相比之下，德国的 5 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 39%，美国的 5 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 20%。如果不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简单的根据银行业集中度来认为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菲律宾、秘鲁等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认为德国、美国反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那岂不是十分荒唐？

那么，在列宁看来，到底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算做帝国主义国家呢？壮壮同志（像很多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一样）引用列宁的著名语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但是，列宁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和语境下做出这一论断的呢？在《帝国主义论》第七章的前几段，列宁是这样讲的：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 ...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壮壮同志，各位坚持“中帝论”的同志，请你们认真地看一看列宁自己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一定义，虽然“能包括主要之点”，毕竟仅仅是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仅仅是为了“简短”和“方便”才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那么，列宁明确讲，“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列宁还特别指出：“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在我们看来，列宁的这一教导，对于批判当今中国左派中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是特别有意义的。

只是在做了上述说明以后，列宁才列举了一般人们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但是，许多不细心的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即使是这五个基本特征，在列宁看来，也仍然是不够完整、不够全面，尤其是不能够适应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需要的。因为，紧接着，列宁又进一步指出：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

所以，在列宁看来，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还必须给帝国主义再下一个定义，否则就仅仅是注意到了“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那么，列宁认为应当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列宁用相当的篇幅来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并没有明确地再提出帝国主义定义的问题。

然后，在《帝国主义论》第八章的开始部分，列宁指出：“**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在这一章的中间部分，列宁特别指出，正是这一“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与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即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和修正主义派别）的存在有着直接的联系：“**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

这种帝国主义“寄生性”的物质基础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从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垄断高额利润”，从而使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可以用这些“垄断高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贵族”：“**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可见，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瓜分世界”，就是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高额垄断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这些，都不是井冈山卫士或者远航一号的发明，而是见诸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白纸黑字。

在后来列宁亲自撰写的《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的第五部分，列宁又特别强调了第八章的重要意义，并且着重指出：“**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接下来，列宁再次强调了，帝国主义

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大量的超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是如此重视这一问题，以至于他特别指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我和井冈山卫士同志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文中，特别提醒同志们重视列宁的这一教导。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同志，不仅不重视列宁的教导，而且对列宁的教导以及我们的说明加以肆意的歪曲和捏造。

现在，我再次请同志们重视列宁的上述教导。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具体的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将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在列宁逝世前一年所撰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事实上已经明确指出，未来世界革命的主要希望不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的东方：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在列宁看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将“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通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自身里的“成熟”来实现，而是通过“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就是说，只有世界广大东方的人民起来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那样，东方的革命才能为西方的革命展开道路。列宁接下来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在世界东方被压迫人民占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才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当然，正如列宁所说的，“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只有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

会无视生动复杂的社会实际，而用僵硬的定义来裁剪现实。就列宁所处的时代来说，沙皇俄国就不完全符合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在列宁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方面（即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攫取大量超额利润）也不典型。列宁与斯大林对沙皇俄国社会性质的有些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比如，斯大林曾经认为，由于对英、法资本的依赖，旧俄国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半殖民地”性质（相关史料见，阮大荣，“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一期）。

列宁认为，沙皇俄国尽管在经济上较为落后，但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沙皇俄国通过对东欧、中亚各民族的征服而占有了广大的殖民地。按照列宁的计算，1914年，沙皇俄国的宗主国部分仅占沙俄总面积的24%，而殖民地部分占沙俄总面积的7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今天的 world 历史条件下，公开的殖民地已经很少了。我们判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应该主要根据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一般的、主要的特征，即其垄断性和寄生性，以及由垄断性和寄生性所决定的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剥削所形成的“高额垄断利润”。在这几个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某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疑似帝国主义国家）是否通过对外政治和军事干涉而控制其他国家的内政，从而剥削和压迫若干个附庸国，是否发动或参与过多起对外侵略战争等。如井冈山卫士在“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中所论证的，以上几种情况，都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将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若干基本特征中个别的一个两个特征，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完整定义中机械地割裂开来，硬套在中国现实上，不仅无助于马列毛主义的进步，而且正如列宁所说，将使得我们“一步也不能前进”。

归根结底，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还是属于世界的“西方”？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属于世界的“西方”或者将要属于世界的“西方”（这是“中帝论”不可避免的推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不仅中国的工人运动必然要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将是没有保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是属于世界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那一部分，那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论断仍将是完全正确的。

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们，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最终可以胜利呢？相信还是不相信“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呢？

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笔记 (2018年9月9日)

远航一号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根据毛主席在陕北红军大学（即抗大前身）的上课教材写成的，总结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经验教训。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深入浅出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概括了当时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范例。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这篇经典著作，为的是结合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实践，初步地概括当前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据此对当前左派内部关于一些具体工作的分歧提出意见。

战争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第一章中，毛主席开篇便说：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这里，毛主席列举了战争规律从一般到特殊的递进关系。

今天，中国的一切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进步分子所进行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有多种形式、多个方面，但是在本质上、归根结底，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别的国家的人，我们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情形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情形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

毛主席说：“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了一个事物的规律，就可以将这种规律用来为人们的实践服务。认识了战争的规律，就可以打胜仗。认识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无产阶级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就可以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

要研究、了解某一个事物的规律，就要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以及那个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就是说，要了解一个事物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

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毛主席以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为例说明了“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全局是组成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但是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上，全局是决定性的：“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关系到全局的指导规律，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的实践经验（各个局部），但是它并不直接等同于人们的经验，而是要从长期、反复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

认识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实践。人们的实践能不能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客观的实际。

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毛主席说明了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这些，就是后来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提高，逐步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

在这里，毛主席将古代军事家孙子关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做了阐释。毛主席批评了那些“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指出他们“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也常常有“鲁莽的专凭热情的”积极分子，因为缺乏详尽的调查研究，又缺乏对于几个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相互关系之间的科学分析，从而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或者经受不住周围人士的鼓动，而采取了实际上有利于资产阶级、有损于无产阶级的步骤。

现代中国阶级斗争的特点

在第二章中，毛主席回顾了到 1936 年为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荣历史。今天中国的左派队伍，还没有这样的光荣历史。不过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按

照当时的理论观点，毛主席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沿用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说法。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大量的革命工农积极分子参加（主要是革命的贫苦农民）、但是主要是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政党。

另一方面，虽然今天中国的左派队伍还没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中国已经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无产阶级队伍将是在中国（也可能是在世界上）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的社会基础。

在第三章中，毛主席总结了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并且指出，这四个特点规定了红军的基本的战略战术：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却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

今天，我们研究和从事中国的阶级斗争，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现代中国（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就是指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时代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从这些基本特点出发，规定了中国无产阶级以及向无产阶级靠拢的一切进步分子要遵循哪些战略和战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怎样运用这些战略战术？

在 1949 年至 1976 年间，中国发生了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这次革命失败了，但是它留下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精神遗产，在工人阶级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准备了未来革命的起点。

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九十年代初确立并巩固。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发展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半外围工业国。这个半外围工业国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有着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并且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中心；但是它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主要从事中低价值的出口制造业，因此它的资本积累和利润率高度依赖于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高强度剥削。为了维持这样的高强度剥削，就需要政治上的专制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能力。

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中国也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工业和服务业无产阶级队伍。这后一方面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必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可能性。

资产阶级的政治专制不仅侵犯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侵犯了其他各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也侵犯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就使得客观上存在着在无产阶级、其他被压迫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反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因此，也就产生了上述各阶级争夺该联盟领导权的问题。这种领导权的争夺，将决定着这个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将提出怎样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以及这种要求能不能提高到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所不能容纳的水平。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政治上最活跃的。因此，各阶级争夺反资产阶级政治联盟领导权的斗争在形式上表现为小资产阶级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多数是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的右派既有“民族主义”的派别，又有“自由主义”的派别（即自由派）。其中，自由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代表着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与跨国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联系较为密切的一部分。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向资产阶级要求给予他们本集团以充分的政治自由以及一部分的参政权，以此作为支持资产阶级推行反动的“市场化改革”（如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交换条件。

在形式上，自由派争取的是全体人民的政治自由。但是这样做，是为了争得各被压迫阶级反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领导权，并且确保这一联盟的基本要求不超出稍微改变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范围。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对特权地位，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可以确信，在任何形式上是普遍的政治自由中，他们这个集团将在事实上成为最大的乃至唯一的受益者。

现阶段，中国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广泛的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但是尚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但是，中国已经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左派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有可能在将来向无产阶级靠拢，并为无产阶级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进而融合到更广阔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

现阶段，初步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团体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向自由派做斗争，争夺反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领导权。这种斗争，将不会是削弱各被压迫阶级的联盟，而是加强这一联盟；这种斗争，将不会是破坏各被压迫阶级争取到政治自由和形式民主的前景，而是使这种前景变得更加可靠和更加现实。正如 1989 年的经验所

证实的，任何自由派领导的、形式上由各被压迫阶级参加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的运动是必然归于失败的。

反围剿和反对政治专制的斗争

在第四章中，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并且指出“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规律。

相比之下，现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不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是在资产阶级掌握巩固的政权并实行政治专制条件下的大量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这样，无产阶级、其他被压迫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经常要面临如何面对资产阶级国家直接镇压的问题。

在这方面，中国自由派的基本策略是效仿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进行过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或者“公民不服从运动”。那就是，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在政治上落实所谓“普世”公认的“人权”、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宪法中的纸面条文，并围绕着这些要求组织“公民抗议”，如果因此造成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被捕，再围绕着营救被捕人员发动更多、更大范围的抗议。在形式上，自由派通过这种政治抗议活动以及部分人员的牺牲来占领“道德高地”，削弱现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彰显”现政权的行为与宪法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差距）。在实质上，自由派通过这样的政治活动来实现并巩固小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动员，向资产阶级显示自己是一支有效的政治存在，进而作为与资产阶级政治交易的筹码。

自由派的这种政治动员方式，对于很多小资产阶级左派也是有影响的。一些左派同志，由于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自由派的这种政治动员方式进行有效的分析，因而不了解这种政治动员方式赖以存在的实际的阶级基础，反而机械地模仿自由派的一些政治动员方式，从而不仅不能达到左派的政治目的，反而对左派的政治事业有所损害。

对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史的简单观察就可以了解到，自由派的这种政治动员方式并不是始终一贯成功的，而是在有些时期相对“成功”一些，在另外一些时期就相对失败一些。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政治专制“时松时紧”的现象，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受自由派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左派，都不能真正地给与解释，因而往往只能被动地应付这种政治上的周期反复。

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专制，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其他压迫力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那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力量是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的，并且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越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是迫近，资产阶级国家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加严重。

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只能根据当时阶级矛盾的具体状况、资本积累的基本要求有选择有重点地使用它的镇压力量。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镇压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多盲区，“天高皇帝远”的事实是经常的、大量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夺回了政权的党内“走资派”集团（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迫切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充分的政治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当局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采取了某种怀柔政策，给他们以一定程度上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以此来鼓励他们配合当局的反毛、反文革的意识形态反革命。但是，因此，也导致了小资产阶级右派政治野心膨胀，并造成了城市工人阶级政治动员的危险。这一危险，最后是经过当局的断然暴力镇压才得以克服。

九十年代，是一个政治上比较黑暗、沉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小资产阶级右派实际上接受了体制内小伙伴的角色。在他们的配合下，资产阶级向城市工人阶级大举进攻，完成了大部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打垮了老工人阶级。

到了本世纪初，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感觉自己的统治已经比较巩固，稍稍缓和一下阶级矛盾对于保持稳定统治是比较有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温政权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对于左、右派的“民间团体”都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

到了2008年以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2008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于资产阶级的信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此后的几年，左派领导的群众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新兴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到2012年以前，这种群众斗争的浪潮已经发展到迫使整个统治集团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发生动摇的地步。

2012年的政治变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2012年以后，各小资产阶级左派团体公开、合法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小了。尽管如此，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仍然在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迅速增长，资本家利润率迅速下降。到了2014年以后，已经迫使沿海各省的制造业资本家纷纷关厂撤资。到了2015年，资产阶级国家已经不得不直接介入，打击抓捕一线的工人积极分子。

近期的打击南方“劳工NGO”的行动是上述镇压活动的进一步延伸，即从镇压一线的、较无背景的工人积极分子发展到镇压有一定背景的、得到跨国资本某种庇护的自由派工运积极分子。

资产阶级政治专制存在的历史条件

资产阶级政治专制，作为一种特定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其存在与否是有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当这种历史条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政治专制便不再能够维持下去。

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一方面有来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压力，另一方面改变统治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积累也比较有利，于是资产阶级逐步用“自由民主体制”代替了政治专制。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少数核心国家（主要是在北美和西北欧）的政治演变历史。无论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和现状来说，这都是一种特殊情况而不是普遍情况。然而，中国的自由派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左派，由于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以及一部分人的有意歪曲），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的特殊的政治历史演变情形认定为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般的发展规律，并且认为“自由民主体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这种幻想将被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实际发展所打碎。

第二种情况，是在外围、半外围的一些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斗争的高涨使得资产阶级政治专制无法维持下去；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工人阶级又不能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将斗争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资产阶级也没有力量建立起稳固的“自由民主体制”并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这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其中比较严重的，就发展为所谓“失败国家”，这在中东、中亚、非洲、南亚都是比较普遍的，目前正在向欧洲、拉丁美洲蔓延。

第三种情况，可能主要发生在某个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半外围大国。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斗争的高涨使得资产阶级政治专制无法维持下去。但是，与第二种情况的区别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及工人阶级政治水平

的跃进，工人阶级能够掌握群众斗争的领导权并领导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突破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将斗争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这种胜利的前提，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右派掌握群众斗争的领导权。如果是后者，那么斗争的前途，将不是稳定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体制”，而是长期无法克服的积累危机和政治、经济的僵局；严重的话，会造成国家解体和社会的全面崩溃。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佳士运动的争论与反思

(2018年12月13日)

青年先锋

一、佳士运动失败了吗？

在佳士运动接连遭受挫折的今天，我们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让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运动在起点上就栽倒了。但是，在11·9抓捕事件和集体检讨运动的悲伤时刻，我们不能忘记运动同样是有成绩的。

反思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了。反思不是居高临下地指责运动的不成熟与策略的不完善。一些左翼内部的批评声音不仅不是建设性的，甚至反而质疑运动本身的合理性，暴力镇压后，现在更是寒蝉般噤声。指责运动脱离了佳士工厂的普通工人，缺乏工人基础是最主要、也最严厉的批评声音，例如质疑工人积极分子不扎根工厂发展工人、运动在工厂外展开、学生取代工人成为抗争主体等等。这些声音不仅对运动中的积极工人和学生不公平，而且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本身抱持着过于苛刻的要求与期待。

运动是有必然性的，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工人阶级与资本-国家联合体的对立决定的。一次运动却是有偶然性的。佳士工厂的几名工人在已经被资方遣散出厂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在大门外抗争；在积极工人和声援群众被捕后，左翼学生只能选择到当地政府抗议。运动的发展过程并不能预先被设计。在运动的现场，积极工人和声援学生做决定和动员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工人代表和左翼声援学生只能在当时的情境下决定，是继续还是放弃运动？在这样的情境下，指责运动缺乏工人基础就是在指责他们发动了运动本身。

反思运动也不是单方面地指责运动中策略的疏漏。特别是在中国的工人运动经验还不丰富、积极分子和左翼学生整体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运动中的策略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可以做事后检讨与策略改善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运动中网络舆论的宣传、冲击警察局等过于激进的行动等都值得改善。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检讨与策略的讨论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服务当下与未来的运动。回头看不是为了瞻前顾后、畏缩不前，而是为了再出发。

所以，运动的反思首要的问题是，怎样的反思有助于服务当下与未来的运动？当下左翼内很多批评的声音或许过于纠结运动中的种种细节，结果是反思走错了方向。在当下工人阶级的行动意识刚萌芽、运动在国家与资本的打击下总是羸弱的背景下，我们最应该反思的问题不是被抓捕的工人、现场的学生到底有哪些对与错。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在这场运动中，泛左翼的关注者们为什么没有迅速地团结起来为运动提供支持，反而在围观、在围观中滋生了分歧、在分歧中出现了太多无益于运动的争论与批评？

左翼内部的争论中，所谓的宗派之分、路线之争占据了很大空间。但是，我们其实不必进入这些争论的细节。这些争论白白消耗了运动中的很多精力，反而影响了左翼的团结。如果说策略之争还有其现实意义，所谓的路线之争完全不属于现在的问题。恰恰相反，以路线之争来指导策略之争，反而先杜绝了左翼内部分分析与对话的可能性。

宗派主义、路线之争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争论。我们要用运动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运动。从运动的视角来看，即使有理念之争，左翼当前的运动议程应该是一致的，从总体上支持工人组建工会，到每个事件中声援工人与学生、营救被捕工人与民运人士，分析与对话是为了服务共同的运动。

所以，在佳士运动接连遭遇挫折之际，反思的重点更应该放在泛左翼的力量该如何支持当下和未来的运动。为什么除了学生以外，现场和媒体上站出来的左翼人士还不够多？媒体和网络上的声援和宣传工作，是否充分发挥了我们传播的能力？除此之外，表达支持的方式还可以有哪些探索与尝试？在国内局势过于紧张的当下，海外的左翼学生和热心人士能够为营救工作做哪些贡献？

运动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还有时间从长计议。在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运动中，减少对工人和学生的伤害，是所有泛左翼和热心人士的共同期望。但是只反思这一次运动里声援学生哪些地方做错了是不解决问题的。一个完美的运动策略也不能带来大团圆的结局。工人运动是阶级力量的发展与对立决定的，运动中的冲突也是如此。想象一个靠策略来避免国家和资本的破坏与打压的运动是不现实的、过于天真的。

只有认清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认清了工人阶级和资本以及常常与资本联合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对立，才能真正反思佳士抗争的过程与得失。因为当下的运动，必须放在前面两部分的背景下来理解。

二、佳士工人的斗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有一种主要的批评，认为佳士工人的斗争与声援团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是过激的、脱离实际的、脱离工人群众的；进而认为佳士事件被谋求光环的“政客”所主导，制造政治明星，用博眼球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取代了切实的工人运动；由此过早暴露了学生社团的体系网络，招致了当局严酷的打压，参与的工人与学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实质上是被利用和坑害了。从这种批评的视角出发，那么整个佳士事件的行动都是不应该参与和支持的，当局 11 月份的打压更使得一些人加强了这种认识。

这样的认识首先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佳士工人的斗争以及后续的声援，是带有着必然性与必要性的。从经济形势发展、工人阶级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工人们提出超越经济诉求的制度性诉求——即组建工会——是必然的。

首先，随着标准更高的新一代农民工成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以及老一代农民工对稳定保障待遇的需要不断提高，工人们对于提高待遇和权利的渴望是愈发强烈的。而工人们越来越发现，要保住争取来的暂时性经济成果，就需要进一步突破资本的束缚，取得生产管理制度上的成果。尽管要求组建工会的直接动因往往是经济动力，但在佳士事件中工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反对“佳士十八禁”这种不合理的工厂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可以随时给敢于争取经济利益的工人“穿小鞋”。就像沃尔玛的“综合工时制”可以被用来随意调班，整治不听话的员工一样。而要反对这种管理制度，相对长期有效的途径就是组建工会来表达诉求。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早已进入了转折期，是否能延续稳定增长取决于能否找到新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点，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高端产业领域的争夺中占据足够的位置。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争夺的一次体现，这种争夺可能难以一次决出胜负，但不论如何长期来看始终会分出强弱。强势一方的社会矛盾将有一部分被转移到弱势的国家，但其本国的经济斗争、组建工会的斗争也可以由此具有更大的空间——争取工会并不等同于改良主义，这反而有助于在危机时避免群众听信繁荣时有

用的改良主义。至于竞争失败的国家，阶级矛盾将会被激化，政治性的工人斗争将更容易被动员起来，组建工会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

最后，随着外围国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纳入雇佣劳动者之中，原本的廉价劳动力会逐渐提升其价格，原先因为劳动力需求不足而彼此激烈竞争的工人转而要求工会的可能性也会逐步提升。总而言之，像佳士工人这样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是各种可能趋势所组成的大势之所趋，即使不是在今年提出来，也是迟早、早晚要提出来的。

最大的争议就在于，佳士建会工人的这次行动是不是太早了，太操之过急了？其实，我们不如换一个问法：我们工人什么时候才能尝试去迈过这道——我们刚才证明必然要迈过的——坎儿呢？有人说要等待时机合适，要等待工人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那所谓一定程度指的到底是多少，不是要通过尝试才能得出的么？难道靠坐在电脑面前感受，就能感受得出来的吗？难道其他人、其他工厂的经验，就一定适用吗？只有靠实实在在的尝试，才能明白机会如何。而在尝试中，事情的进展速度未必是能够主观控制的。建会工人们争取了近九十条签名，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可能没有预想的多，但这是尝试的结果。

不幸的是，资方迅速采取行动，与国家机器合作，暴力赶走了建会工人。他们没能动员起足够的厂内力量来支持自己，但是这是一次尝试难免要承担的风险，他们作为有主体性的工人自己选择了去承担，那就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了。并且，从这一刻起，我们所面对的形势就从厂内斗争转向了厂外斗争，讨论是否脱离厂内的工人群众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必然要引入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学生。我们之后会讨论，学生的参与也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接下来的争议是，工人们是否应该挑战当地警方的力量？以往的工人行动中有对警察力量的挑战，但很多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取性地要求惩罚偏袒资方殴打工人的警察，这种政治性强烈的行动过于冒进了吧？的确，这个时候行动的风险愈发增加，而积极工人自身和外围支持者的风险估计不足确实值得反思。但是，我们同样要意识到，工人斗争从纯粹的经济斗争逐步上升为带有政治性的斗争，也是运动必然会经过的一条道路。工人要组建工会，就要努力跨过——国家机器（包括上级工会）的妨碍——这道坎。工人的街头行动不是不可能突破妨碍，不是不可能使国家机器妥协的。但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行动，只能通过尝试来了解。不尝试是不可能体会到如何突破，因而也就不可能突破的。我们说要评估风险，但评估风险本身也要在不断地试探中得出答案。

当然，当时的评估存在过于乐观的问题，但如果他们已经预料到可能最坏的情况，并且仍然愿意投身其中，那这也是工人们的选择，是他们在富有战斗性的左翼理念下作出的判断，而不是任何人强加的结果。总而言之，要尝试就要冒风险，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尝试，这是斗争者自己的选择，也是必然有人要做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更好的分析、讨论、评估风险，以及做好传达和应对的工作。后者是这次运动中斗争者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前一个问题更需要在外界旁观的左派进行反思——当有人敢于做出必要的尝试时，是否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是否应该想办法让这种尝试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到，那尝试的失败同样也有旁观者的责任。

工人运动中既需要有人去冲击隐蔽的界限，去尝试可能的手段，同时也需要有人规避高收益、高风险的行动，从事慢工出细活的力量积累。两者之间本就应该相互支持，乃至充分协作，至少不能给彼此造成妨碍。事实上，对工人支持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除了简单的出人出力，联系社会力量，也可以在周围甚至默默地在内部进行宣传，这取决于支持者自己的评估。提出切实的意见和建议也是支持

方式的一种。虽然有些斗争者存在着不接受异见的问题，值得去反思，但这种民主讨论的氛围是需要共同去营造的。并且，很多时候通过参与一些基本的支持行动，建立彼此较好的信任关系，也更有利于意见的交流。

三、左翼学生的历史性参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7月27日积极工人被抓走之后，学生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学生是否是在某种“非法组织”的利用下，取代了工人，制造了“政治明星”？是否因为过早暴露了社团力量，而沦为了被坑害的角色？

对于“学生取代工人”的问题，我们刚在已经提到过。当积极工人被打击出厂后，短期内再大规模动员厂内工人就缺乏可能了，而想要实现反对工厂、警方打压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动员条件——就不可能不引入社会各界包括学生的参与。“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是《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趋势，如果说工人接受了主流的规训不去斗争是自然的，那么工人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发起了斗争，又去结合左翼学生的力量，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学生组成声援团的勇敢斗争是佳士运动里最振奋人心的部分。左翼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与工人的联合、斗争的勇气在运动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在8·24声援团被袭击、抓捕不断发生之后，批评的声音反而逐渐压过了鼓励的声音。对学生的检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和积极分子取代了工人的主体性，变成了运动的主角，不仅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甚至还制造出了一些学生运动明星，反而模糊了运动焦点。二是学生们太稚嫩、斗争经验太少，结果暴露了学生社团和工人服务机构的网络，最终导致在8月以来直至11月9日的警察抓捕中，左翼运动力量损失惨重。

进步学生和支持他们的积极分子作为在运动现场的唯一进步力量，反而因为他们的行动力遭到了批评。这样的批评显然是不公平的。正如前面所说，只有空想家才想象完美的运动，行动者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与动员中做出选择。前事不忘是为了能够给未来的运动提供宝贵的经验，而不是为了攻击过去的行动者。

无论是左翼内部的阴谋论者，还是官方企图抹黑运动的新闻宣传中，都有一种把学生说成是被利用、被操纵的倾向。阴谋论者认为学生被操纵成了靶子，过早暴露左翼学生的网络成为官方打击的靶子；官方宣传认为学生被操纵成了工具，是境外势力破坏中国社会和谐、甚至颠覆政权的工具。

这样的批评采取的还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进步学生看似严肃，其实非常轻蔑的。因为这两种声音都不相信是学生们可以主动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动靠近马克思主义、主动为了佳士工人的合法权益采取了行动。否定学生的自主选择，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从根本上否定佳士运动中学生声援团的进步性的想法。在不断的抓捕和舆论攻击反复打击运动之后，这些声音改名换面以后，以检讨运动的名义卷土重来。因为损失太大，所以学生和积极分子不应该暴露得太快；因为要保存自己，所以应该避免正面冲突。从检视运动的得失滑落到取消运动的呼声，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一旦停止对资本和维护资本利益的国家暴力的幻想，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根本不存在完美的运动，因为损失来自于资本和国家暴力的打压，而不是来自于运动者。在一次运动中，我们可以检讨佳士运动冲击警察局太冒进。然而，在对运动的反思中，应该放弃对所谓开明上层的幻想。冲撞警察、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的任务是在运动中学会规避、减少以及承受这样的打压与损失。

所以我们不仅应该看到进步学生们主动选择了投身到运动中，更应该看到学生们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未来的学生骨干从这里开始成长。在这一次佳士声援团的运动过程中，工人中的组织积累不足、运动的宏观计划不足、内部交流不够民主、宣传手段不够新潮等问题都暴露出来。这些问题是在运动中发现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运动中才能锻炼。学生是左翼力量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佳士运动锻炼了骨干学生的战斗力，也为学生和工人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榜样。短暂的低潮不能阻挡进步学生天然的正义感和向马克思主义靠近的脚步。

四、左翼运动的成果

在 11·9 抓捕事件和集体检讨运动的悲伤时刻，我们不能忘记运动同样是有成绩的。

中国的各种社会事件中，话语权一直是掌握在国家与右派手上的。他们的思想武器是不是国家主义，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在佳士运动中，左翼的行动被更多的人看到了，左翼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了。当市场化带来的阶级冲突与社会不公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多人讨论时，市场经济的迷信将会开始被挑战。当更多的青年学生看到了工人的处境、工人为争取工会的努力时，他们对工人维权的理解与同情增加了。左派的主张因而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必然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与共鸣。

然而左派并不会自动掌握话语权，正如同工人也不会自动支持所有的运动。佳士运动表明了工人争取组建工会的必然性。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工人的基础不好，即使有积极工人要求组建工会，还不能树立威信、得到多数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很多基层的服务工友、建立信任、组织工友的工作还需要大量投入。佳士运动中真正站出来支持的人数有限，说明还需要培养大量的支持左翼运动的人才。进步学生在佳士运动中的表现给中国左翼力量指明了一个方向。中国有数千万的大学生，中国的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命运紧密相连。在学校中一定可以培养更多的左翼人才。

左翼也应该把握在各种社会事件中发声的机会，和右派抢夺定义中国现实问题的话语权。过去的 20 年，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价值的自由派垄断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发声渠道，建立了市场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地位。因此左翼更应该加强团结，抛弃一些不合时宜的路线争论，重新将公共讨论聚焦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之上。

此刻我们反思佳士运动，不是为了检讨而检讨，更不应该陷入对过往错误的自怨自艾之中。此时再去幻想可以取消运动中的错误，其实无异于放弃当下的努力。在很多学生已经暴露、11·9 抓捕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反思的方向应该是如何最小化其他的进步学生的风险、如果在最小化风险的基础上开展营救而不是取消运动。

在反思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与抗争意识的觉醒，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进步学生在运动中得到的磨练与成长，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每一次反思之后经验与策略的积累。任何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相信，工人与工人的结合、工人与进步知识分子的结合，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于被捕的工人和学生们，我们内心万分地悲痛，但是我们从悲恸中走出来，接过了火炬，运动将进行下去。

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讨论提纲） （2018年12月25日）

远航一号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广义的“马列毛左派”的发展。

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首先是表现为数量的增长（目前全国无产阶级的总数约为2亿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约四分之一），又表现为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增强，表现为无产阶级斗争数量的增加，表现为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发生了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

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是中国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目前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但是，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力量增强，是曾经反复出现过的现象。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是资本主义出现重大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先兆，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革命形势的必要条件。但是，以往，在其他国家，这种不稳定和危机最终都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要发生革命，其基本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增强到资本主义积累所无法容纳的限度，在经济上表现为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并通过经济危机（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也不是单纯由于债务、泡沫、需求下降引起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危机，不经过革命或重大制度调整无法克服的危机）与持续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从而决定性地削弱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我们在现阶段的理论任务，是努力了解中国未来革命形势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及历史规律，了解未来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了解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与无产阶级有机结合的政治力量，但是是一支在政治和思想上十分活跃的力量。就其阶级基础来说，在前期（2000-2012年），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原国营企业反私有化斗争积极分子（“老工人”）、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原官僚特权集团中被排挤出来的部分（“老左派”）、原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其社会经济地位基本属于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半无产阶级）。2012年以来，激进的大学青年社团及由此派生的各种小组已经成为“马列毛左派”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说明在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趋势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正在成为“马列毛左派”最新的、增长最快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没有公认的、统一的理论和行动指南，带着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天生缺陷，在政治作风上充满着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理论上和哲学上则往往沦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俘虏，各种错误思潮流行。这些缺点，是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尚未真正与无产阶级结合、中国革命形势尚未高涨之前不可避免的。我们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要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宗派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做斗争，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宣传并扩大正确思想在左派队伍中的影

响，逐步形成符合当前中国阶级斗争实际的新时代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为未来的大革命做思想上初步的准备。

在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质，正确地总结毛主席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又为什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里还是沿用“复辟”这个说法）。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派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不是必然性）。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即被“走资派”篡夺），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至于为什么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为什么会上台，文革理论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旧的剥削阶级残余的思想、文化、习惯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党内的反映。这一套对修正主义上台及资本主义复辟的认识，目前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所接受的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上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这一套理论的实质，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不是群众或奴隶创造历史。这一套理论，回避了“修正主义”赖以产生并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无论是旧剥削阶级的影响还是小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不能解释“修正主义”为什么会成为革命党内不是某种个别倾向，而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占优势的力量。这一套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修正主义”上台，没有遭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坚决反抗。这一套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新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马上陷入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而是在相当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为顺利地发展。

这一套理论的产生，在当时有不得已的地方，即毛泽东及其同志们无法直接面对新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已经形成并占统治地位这一历史事实（不是思想感情上无法直接面对，而是政治现实中无法直接面对）。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一理论仍不加以鉴别和改造，并给予扬弃，就不仅不能指导当前革命的实践，还可能造成相当的危害。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可能重蹈覆辙，失败或者短命。

要正确地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就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搞清楚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社会，什么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什么是阶级社会在未来走向消亡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消亡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是这样总结的：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

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实现“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要“废除阶级”，仅仅“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说，自从阶级社会产生起，自从有压迫和剥削起，劳动者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斗争，为什么在以往都失败了呢？为什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失败了呢？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什么“生产不大发展”就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过去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论述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割裂开来，笼统地讲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把共产主义降低为是要满足人们无限的消费欲望（反过来，只要这种消费欲望还没有满足，共产主义也就不能实现，各种不平等和剥削也就顺理成章）。

什么叫做“生产不大发展”？“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就是说，当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展的时候，社会剩余产品的总量还不够多，因而全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得不把自己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时间用于生产必需品的劳动（这种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产品占全社会总产品的比例并不低。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地租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往往占到农民收获物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但是，按照当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以及按照当时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形式），无论这些剩余产品怎样分配，都不能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普遍大幅度减少的条件。

只要绝大多数人仍然被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体力劳动所束缚着（“完全委身于劳动的”*exclusively bond slaves to labor*），就只能由少数人来“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这些少数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所以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就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说，直接生产劳动与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劳动之间的分工，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

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但是，“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都不是阶级社会赖以

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持久的和决定性的因素。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失败，表面上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上台。但是，“修正主义者”上台只是一定的现实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结果。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导致了“修正主义者”上台而且使其权力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不是“修正主义者”如何利用“狡诈和欺骗”，如何违反公平和正义。

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统治阶级就必然要“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从而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所以，只要还没有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只有社会的少数人能够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社会剩余产品就必然为少数人所占有，就必然有压迫、有剥削。

恩格斯在晚年的这些论述，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思想的。

还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克思在这里讲，只要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就必然要“死灰复燃”。就是说，除非绝大多数人能够从“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中摆脱出来，阶级社会是不可能消灭的，社会分裂为阶级是不可能避免的。

紧接着，马克思又讲了一段话：

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可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关于“一下子”，英文翻译是：Empirically, communism is only possible as the act of the dominant peoples “all at once” and simultaneously。这一段论

述，提出了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包括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问题。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在过去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教育中，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产生简单说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这一套官方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在斯大林时期成型，又被中国社会主义继承过来。毛泽东主义者，由于理论的局限，也由于政治现实的限制，只能将“走资派”的产生（实际上即新的剥削阶级，毛主席曾在个别场合用过“官僚主义者阶级”）说成是旧的剥削阶级残余思想和意识的结果，到了后期，又提出是因为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也包括因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差别造成的不平等）只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造成的一部分结果。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阶级社会的一个阶段（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说，没有超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部分外围半外围国家为了形成现代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而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也可以说，不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还不仅仅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关键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是少数人，而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占有和支配社会剩余产品。

历史上官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者的理论局限，又被现在中国的各“马列毛左派”青年小组毫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历史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来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迷”。他们对于历史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还在重复着前人的错误，将少数个人的历史作用无限夸大，将“走资派”的欺骗和劳动群众的上当受骗当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淖无法自拔。还有一些托派分子，则简单地将历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形式民主。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基本上完全是由当时社会中主要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来从事的。祭司（僧侣）和军事领袖往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祭司即天主教会（包含了中世纪社会中主要的“知识分子”），国王和各级封建领主即军事领袖。在中国古代，士绅地主阶级既是社会经济剩余的主要占有者，又是脑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形有所不同，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员来从事科学研究及其应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持和巩固又需要大量人员来从事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意识形态等活动，仅靠占全社会人口 1-2%的统治阶级成员已经完全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脑力劳动的需要。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家阶级本身仍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以外，还需要一个庞大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来从事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教育、经济管理、行政司法、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等工作。其中，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是为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服务。医疗教育是为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服务。经济管理、行政司法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社会科学、人文艺术是为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现代小资产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事脑力劳动，他们的劳动力有一定的垄断性，他们从事的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至关重要，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往往显著高于无产阶级，并且有一定的上升入资本家阶级的机会。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无论是否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都包含一部分剩余价值。

现代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分布，依各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在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大约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 20-25%；在半外围国家，大约占 10-15%；在外围国家，则一般不到 10%。

这种差别，除了反映核心、半外围、外围国家资本家阶级可以与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分享的剩余价值的量依这些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有所差别以外，也说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脑力劳动高度集中在主要核心国家，而体力劳动则主要由外围、半外围国家承担。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阶级社会消亡的历史条件又是哪些呢？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是这样讲的：

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说，“阶级的划分 ... 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历史的理由”在英文版中是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就是说，阶级社会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有根据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恩格斯说：“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恩格斯展望了未来无阶级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商品生产的消除、用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来消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灭人对人的统治，消灭人被自然界的统治，实现人们自觉调节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自觉调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的问题是，“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怎样才能消灭“生产的不足”，从而消灭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呢？是不是仅仅是通过“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呢？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阐述，但是结合前面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论述，不难推断出大意。

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所以，“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只有通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才能消灭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而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必须使得绝大多数人不再为直接生产劳动所束缚，从而“社会的共同事务”不再是少数人专门从事的特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普遍地、大幅度地减少绝大多数人的劳动时间，使得他们可以有时间从事各种脑力劳动，有时间参加各种公共性的、创造性的、有利于体力智力发展的活动，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并且从事社会的各种“共同事务”。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 48 章中的一大段论述：

我们还看到，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象是自由协商同意的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象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失；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英文版的这两句话译为：“It is one of the civilising aspects of capital that it enforces surplus-labour in a manner and under conditions which are more advantageo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elements for a new and higher form than under the preceding forms of slavery, serfdom, etc. Thus it gives rise to a stage, on the one hand, in which coercion and monopolis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its

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advantages) by one portion of society at the expense of the other are eliminated; on the other hand, it creates the material means and embryonic conditions, making it possible in a higher form of society to combine this surplus-labour with a greater reduction of time devoted to material labour in general”；其中“on the one hand”之前的it，和“on the other hand”之后的it，实际上指的都是“资本”而不是“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由此可见，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在这里说，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将“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自由王国”才真正开始了，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已经终止以后，从而“劳动”不过是人们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体力和智力充分自由发展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

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创造条件；这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并且会大大超过人们的物质需要提高的程度，从而能够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从而全体社会成员（而不仅仅是少数人）能够参与管理“社会的共同事务”，这样才能造成阶级社会消亡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才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认识，全世界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决定了全球物质消费的上限。未来建设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斗争，只能在全世界生态可持续性要求的范围内，在限定全球物质消费总量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缩短劳动时间来实现。

那么，历史上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无阶级社会的一个初级阶段呢？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生产方式（哪怕是过渡性的）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一部分？

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来自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又指出，苏维埃政权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但是那时还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说法；毛主席在非正式场合说过，马克思、列宁都不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到了后来，只有“一国”，怎么办）。马克思、列宁都指出过，在这个“初级阶段”，还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还会有“资产阶级法权”，还会有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但是，绝不是说，这个“初级阶段”还要分裂为阶级；绝不是说，社会剩余产品由少数人控制；绝不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不但没有逐步消亡，反而巩固和扩大；绝不是说，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而且绝大多数人仍然将其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束缚于直接生产劳动中。

而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虽然形式上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实际上广大劳动群众不掌握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和使用。社会剩余产品事实上由占整个社会少数的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有同志可能会说，当时的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来支配社会剩余产品的。但是，首先，当时的劳动群众实际上没有有效地监督和替换官僚的办法。连形式民主都不具备，中国也没有经历过短暂的苏维埃民主的时期。客观上，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官僚物质特权。从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来看，早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中上层官僚已经腐化变质，可以为了个人政治算计而不顾人民死活。在文革前，毛主席曾经说，三分之一的各级党和政府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实际上大大低估。从后来的实际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党内没有受到大的反对。包括陈云集团，与邓小平争夺的只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办法及主导权而已。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这个特权集团并且控制党和国家权力的大部分（毛主席基本被架空，只能依靠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系统来平衡党政官僚系统的影响）。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就其独占剩余产品的支配来说，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剥削阶级；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仍然是阶级社会。但是就这个官僚特权集团的历史过渡性来说（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是作为未来巩固的资产阶级的前身），可以不称其为阶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中国，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核心国家水平，建国初期绝大多数人口尚为文盲，完全不具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条件。只要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划分为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就不可避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不是某种形式的阶级社会。

那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社会呢？过去，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有“国家社会主义”说，有“国家资本主义”说，有“退化的工人国家”说。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归根结底，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形态，那么，它有没有历史的进步性呢，有没有历史上存在的根据呢，还是如污蔑社会主义的人所说，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最漫长、最痛苦的道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性质又是怎样的呢？

行动中的红色中国网

(2018年12月)

“菲力克斯”

红色中国网向“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发出了一封建议书，我们的同志对这份可耻的建议书进行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 否认中帝论
- 攻击佳士是小资盲动，否认工会的意义
- 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对立
- 幻想进行国内的局部割据政权

我认为这位同志的这几点总结非常到位。但是结论却不合我的心意。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但其实就根本而言，就是关于“中帝论”的问题。否认中帝论，才会支持一步到位的（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直接无产阶级专政）方法，才会借此否定工会的进步性，才会对国内局部割据（实质就是在其它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时进行内战，可参考《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可以存在》）产生幻想。

这位同志眼观很犀利，马上就认识到了该文的要点是帝国主义问题，但我不知道这位同志为什么会从这篇充满了可耻叛卖的宣言书里读出“左”的倾向。我做的恰恰相反，我是要说的是，这份宣言书是“右”的。

一、帝国主义的定义是很清晰的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障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度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其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切

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论》

而红色中国网是怎么划分的呢，他们开篇说：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如我们一些同志在关于“中帝论”问题的论战中所指出的，将中国资本主义吹捧为是帝国主义，实际上反映了相当一批小资产阶级左派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畏惧资产阶级，夸大资产阶级的“强大”，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这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和“惧怕”资产阶级，“低估”工人阶级力量有什么关系呢？红中网断言，帝国主义是“强大”的，是难以撼动的。

列宁说的恰恰相反：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使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尖锐化，它是从资本主义进入更高级制度的过渡。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垄断必然引起停滞和寄生腐化的趋势。

帝国主义是而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后一个阶段，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列宁《帝国主义论》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矛盾最尖锐的时期，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况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群体是比先前的资本主义群体壮大的而不是缩小的。事实证明随着中国进入垄断时期，学运、工运越来越频繁。难道越来越频繁的学运、工运还不足以证明帝国主义使矛盾激化了吗？而红中网腆着脸说，帝国主义是强大的一个时期，巩固的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丝毫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接着他们又说：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是所谓“帝国主义”吗，是所谓与美帝争霸吗？都不是的。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就是说，中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

系中的外围国家，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也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因为中国在与核心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大量剥削，因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分工中得不到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而只能得到一般利润。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仍然是出口制造业，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仍然要依靠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维持其所谓竞争力。

真是聪明的理论，对列宁所提的帝国主义五个重要特征绝口不提，把资产阶级和托洛茨基的世界分工理论进行一番修订，于是变成了“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旧日本在当年资本主义世界内是个二三流国家。旧日本也处于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压制，也处于世界分工的下游，也被美国赚取超额利润。那么旧日本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喽？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二战前的日本就是半外围国家，还敢和比自己工业强大十倍的美帝打太平洋战争。显然红中网认为旧日本不是帝国主义，对日本在中国赚取的暴利和血淋淋暴行视而不见。同样的红中网对中国在非洲，中东，东南亚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的超额利润也视而不见。红中网的这篇文章的一切就是对此避而不谈，还顺带把俄罗斯也踢出了帝国主义行列。沙俄时期，沙俄这个半吊子国家都能算帝国主义，结果白俄这个寡头垄断的国家竟然不是帝国主义了！白俄为什么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呢？因为他们是“半外围资本主义！红中网的先生们就是这么回答的！”“半外围资本主义”是个什么东西？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帝国主义根本与世界分工没有一毛钱关系。论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垄断程度。当然，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拿些数据，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也好，伪造的也好，官方的也好，民间的也好，是同一出处的也好，是东拼西凑的也好，然后罗列一下，或者做些乘除法，然后去拿一些列宁的一些数据去比对，然后他们得出了结论，看嘛！中国指标没有达到，中国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再看看列宁是怎么说的：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先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有充分根据的了解，我们故意尽量多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十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从中可以看出银行资本等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看出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

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 10 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红中网睁着眼睛说瞎话，叫我们证明 $1+1=2$ ，而他们则是来证明 $1+1\neq 2$ 。谁要去证明 $1+1\neq 2$ 就让他去证明吧！

二、关于帝国主义分歧的深层问题

有的同志不解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判断有那么重要么，为此要大打棍子？十分重要！红色中国网，执意否认中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也否认中国与各大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往第三世界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视而不见，对被中国资本迫害的亿万亚非拉同胞视而不见，认定中国是被赚取超额利润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落后是我加的）如果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被帝国主义赚取超额利润的“被剥削”国家，那么很简单的，中国无产阶级首先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同盟，驱逐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这就是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民族矛盾。这就是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不是因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就是当代普列汉诺夫，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路线！这就是背叛国际主义的无耻奸贼！如果事实不是这样的，就要采取国内战争的方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专政。这两种论断，这两种路线到底哪个是符合列宁主义的论断，哪条路线是符合列宁主义的路线，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三、工会问题

揭露了他们小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的本来面目后，我们也就明白了他们为何如此害怕工会，为什么叫工人们放弃斗争。但凡有脑子的人都能得出以下事实：中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农村基本已经被大工业抽空。那么依靠偏僻的农村进行割据必然会使运动远离无产阶级。而城市中没有集会权，结社权，随意抓捕，是无法扩大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的。多余的赘述完全没有意义，在此也不多说。再引一段恩格斯的话：

即使是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 **也只有继续进行** 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 **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 **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

也就是争取 **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揪出工贼，叛徒，间谍，打倒社会沙文主义！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信奉“中帝论”的朋友们，你们真相信中国革命是可以胜利的吗？
——向“菲力克斯”先生提几个问题
(2018年12月30日)

远航一号

菲力克斯先生，你对我们建议书的“批判”已经读过。你的文章中，虽然多次引用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论》，实际上多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处。关于怎样正确学习和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2018年的夏季，红色中国网曾经与激流网、红旗网、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等展开充分的辩论和交流。你若有兴趣，可以从我们在那个时期发表的文章中选择若干、重点“批判”，以利你“揪出工贼、叛徒、间谍”，你看如何？

无论是讨论“中帝论”，还是总结佳士斗争的经验教训，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探索中国无产阶级解放和胜利的道路。请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么，各位信奉“中帝论”的朋友，希望你们认真思索：如果你们果然认为，今日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在列宁去世以后，在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再也没有发生革命？这种历史现象，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有的同志说，这些国家没有发生革命，是因为主观条件不足。但是，作为唯物主义者，人们的主观条件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不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吗？

你们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可以预期的？还是如毛主席所说的，你们对于未来革命的相信仅仅是那种“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如果你们确实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可以预期的，是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可以实现的，那么请问：“中华帝国主义”有哪些特殊的矛盾，有哪些特殊的薄弱环节，从而决定了它与历史上的以及现存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而我们可以相信，虽然无产阶级在其他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没有胜利但是在“中华帝国主义”中却是可以胜利的？不要笼统地、抽象地用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来解释。那样的解释，既说服不了别人，也不见得能说服你们自己。

我们注意到，信奉“中帝论”的朋友的一部分是认为，中国未来的变革必须首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这里暂且不纠正“中帝论”朋友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理解，首先要指出，据我们所知，即使在“中帝论”朋友中，对于这一问题也是有不同认识的。比如，红旗网的同志虽然赞成你们的“中帝论”，却是坚决反对“二次革命论”的。

那么，咱们姑且就从你们喜欢的资产阶级民主出发吧。一个基本的世界历史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凡是建立了长期稳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的迹象。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幻想，可以选择等待，但这种幻想和等待除了蹉跎岁月以外，没有其他的实际效果。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有朝一日，中国资本主义真的实现了你们所期待的长期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有什么根据认为，那种“民主”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不是一个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泥沼呢？那么多国家的工人阶级自从陷进去以后，就再也无法自拔，中国工人阶级有什么理由是例外呢？

菲力克斯先生据说是“有脑子”的，所以他有资格质询我们：“但凡有脑子的人都能得出以下事实：中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农村基本已经被大工业抽空。那么依靠偏僻的农村进行割据必然会使运动远离无产阶级。而城市中无集会权，结社权，随意抓捕，是无法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的。”

有“脑子”的菲力克斯先生，如果你稍微仔细地阅读一下我们的建议书，想必你一定会读到这样一段话：“在无产阶级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力量之前，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样的根据地不是像井冈山、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那样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农村根据地，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暂时仍然被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着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请问，你的“脑子”是如何告诉你，我们主张在“偏僻的农村进行割据”呢？

按照你的观点，“城市中无集会权，结社权，随意抓捕，是无法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的”。如果说，因为没有集会权、结社权，工人阶级就无法组织，组织了也无法扩大，那么请问，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呢？通钢工人的斗争又怎能取得胜利呢？中国现在每年有记录的约两千起工人斗争、实际发生的约两万起工人斗争又怎么能实现呢？这与你自己承认的工潮、学潮蓬勃发展不是自相矛盾吗？

当然，如果中国的现状是有相当的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可能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造成一些有利条件（但是对于这种有利条件也不宜高估）。但是，任何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现状确实了解的人（如菲利普斯先生说的，有“脑子”的人），难道会否认，这些自由只有通过未来的革命才会真正争取到吗？而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大张旗鼓地向资产阶级要求有这样的自由，除了暴露自己并听任资产阶级镇压以外，还能有任何其他的结果吗？如果佳士声援团的教训还不够，菲力克斯先生何必要匿名隐身于左派论坛，何不索性公开自己的身份，大胆地参加抗议和声援，为争取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做贡献？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当然要争取实现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这些自由，资产阶级是不会给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运动”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如1989年）；所以，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在中国，也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但是，既然只

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争得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权利，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就既不必要也没有可能将自己的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范围内，在一个本来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又倒退回去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所以，菲利普斯先生，到底是我们“害怕工会”呢，还是你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呢？对于一切有“脑子”的人，这是个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2018年12月31日)

远航一号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搞清楚今天中国（也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国）有哪些阶级，这些阶级各自的力量如何，相互关系如何，发展趋势如何，哪些阶级在由强变弱，哪些阶级在由弱变强，这是今天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严元章同志在“七十年来中国工人阶级的辉煌与苦难”一文中将现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轨迹比喻为一条三次曲线，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过程。严元章同志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时代上升到“领导阶级”的历史过程（严格来说，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如毛主席所说，相当大一部分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又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沦落为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过程。这里，咱们重点来谈一谈严元章同志所说的三次曲线的第三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再上升过程。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在说明中国无产阶级的再上升过程之前，首先要讲一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哪些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的划分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客观上处于不同的地位。

在著名的《伟大的创举》（1919年）中，列宁是这样定义“阶级”的：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这里，列宁指出了，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从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就是说，其中一个或几个阶级能够剥削另外一些阶级，一些阶级占有社会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表现为剩余价值），另外一些阶级从事生产劳动却不占有社会剩余产品。

各个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还表现为有些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有些阶级却不占有生产资料（这种占有或不占有，“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但是也可能不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而只是实际的占有或不占有）。各个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还表现为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有的阶级支配他人和自己的劳动过程，而有的阶级则一方面从事生产劳动，一方面被他人支配着自己的劳动过程。所以，我们分析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就要根据某个社会集团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还是被支配地位、是否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我们知道，中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两个最基本的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也叫资本家阶级），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也叫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劳动者（但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最大多数的劳动者）。无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大于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是一切资本主义财富的根本来源。

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靠剥削他人而生的剥削者。一般来说，资本家自己不参加生产劳动。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不是从抽象的、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从不同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配来理解的。看一个阶级是不是有剥削，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剥削，不是看“公平不公平”、“正义不正义”，而是看这个阶级、这个人在

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占有还是不占有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就是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史上，小资产阶级是经常登上政治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所以，有必要特别说清楚“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实际意义。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不是小资本家。小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史上，“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是有个演变过程的。从马克思到列宁，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自身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不剥削或基本不剥削他人劳动，主要靠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生的小私有者，比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概念基本符合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实际（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此外，当时，马克思、列宁在谈论小资产阶级时，也往往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自由职业者”（比如教授、律师、医生、演员等）笼统地包括在“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内。

但是，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阶级状况时，列宁已经意识到，农民是不能与一般的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农民不是铁板一块，像一堆大小小没有差别的“土豆”，农民里面也是分阶级的，有富农、中农、贫农；其中，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贫农更接近无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列宁首先提出了，劳动农民（特别是无地少地的贫农）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革命要胜利，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毛主席发展了列宁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时，又提出了雇农实际上是农村的无产阶级、贫农和下中农实际上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

我们今天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必须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又必须结合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阅读关于“中帝论”问题的辩论材料，同志们应当已经多少听说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说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概念，过去，在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中很少用，但是它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有了萌芽，到列宁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后来又经过世界体系理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的发展。

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马克思多次提出过，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已经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部分，一是占世界人口少数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全世界并攫取超额利润。这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经过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三个结构性的组成部分：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这里说的核心国家，大致上对应着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不仅剥削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通过剥削外围、半外围的劳动人民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外围国家，在历史上往往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不仅被本国的资本家剥削，而且还受到来自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此外，外围国家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在外围国家的农村，劳动群众还往往受到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压迫（比如地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核心国家的人口一般占整个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外围国家的人口一般占整个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在现在的一般的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中，有时会说到所谓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现在算是所谓“上中等收入国家”。有时还会说到所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资产阶级媒体又将原来是“发展中国家”一部分的，但是收入较高、增长较快的国家划分为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其中几个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又被封为所谓“金砖国家”）。这些概念都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就是占世界人口少数的核心国家剥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外围、半外围国家。没有这种剥削，核心国家的财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仅靠剥削核心国家自己的工人阶级，那里的资本家是决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巨量财富的。所以，一般来说，所谓“发展中国家”、所谓“新兴市场经济”，是永远不可能“发达”的。当然，任何规律都会有例外。就像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工人是决不可能成为资本家的。但是通过个人努力和运气，个别工人一夜暴富，爬进资本家的行列，这样的事情是有的。但是如果根据这种例外，就认为，所有工人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资本家，那就是荒谬和反动的。

从阶级结构上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一般是高度无产阶级化的，就是说，无产阶级占核心国家人口的绝大部分。而外围国家，一般无产阶级化的程度比较低，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少数，农业劳动者往往占大多数，在农业生产中往往还存在着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残余。所以，像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秘鲁等国，那里的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那么，中国的阶级结构是怎样的呢？与印度、菲律宾那样的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这样讲，可能有同志不理解。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将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自由民主制度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特定含义的，那就是消灭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土地革命。只有进行了土地革命，才能消灭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将大量的农业生产剩余集中起来，用于资本积累，用于工业化。大家如果读毛主席的著作就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是最先进、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在今天中国的农村，基本上不存在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束缚。

那么，咱们今天中国农村的“农民”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属于什么阶级呢？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吗？如果“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咱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人？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青年学生，又是什么阶级？

从经验上来说，大家都知道，在农村的劳动者，无论是从事农业的，还是从事工商业的，其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一般是不如城市工人的。如果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的收入反而大大低于无产阶级，那么这个概念是不是有问题？进一步分析，在今天中国的农村，纯粹靠小商品生产（就是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又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为生的商品生产）为生的小私有者几乎没有。几乎所有的农村劳动者家庭都有一人或数人在城市“打工”。从官方统计来说，“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所谓“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综合以上情况，今天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无论是从事农业的，还是工商业的，就其阶级成分来说，主要是半无产阶级。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或者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一个阶段，给资本家打过工，做过雇佣劳动者；或者，他（她）的家庭中有人在外面打工，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为什么说“半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那些其家庭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来自于雇佣劳动（也就是为资本家“打工”）的劳动者，而半无产阶级则往往要依靠雇佣劳动以外的形式来获取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劳动者往往很难通过雇佣劳动以外的形式来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半无产阶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半失业状态，因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或者说，充当着就业较为充分、收入较高的无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队伍的产业后备军。

回到我们的主题，到底谁是小资产阶级？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指的是大学教师、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等人。人们在近年的日常生活中，常常笼统地使用“小资”的说法，除了包括传统上所说的“知识分子”以外，还包括一般的所谓职场上的“白领”（如企业中的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这说明，人们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认识到，这些人有一定的共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有一定的特殊性，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工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形式上一般是雇佣劳动者（也有一些特殊职业，如医生、律师，可能采取所谓“自我就业”的形式）。但是，与无产阶级不同，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比较高（比如，要有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有比较高的“门槛”，多数无产阶级家庭无法承受。最主要的，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必不可少，比如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技术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力再生产发挥关键作用（如教育、医疗卫生），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学教授、记者、演员）等。所以，资产阶级对于从事这些工作的小资产

阶级愿意做一些有限的让步，给他们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有较多的机会移民到核心国家。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在核心、外围、半外围之间是高度分割的。但是，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对统一的，因而在核心、外围、半外围之间，小资产阶级劳动力相互之间的工资差距要小于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相互之间的工资差距。这个特点决定了，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上层）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更倾向于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政策，如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即所谓“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所谓“自由派”的主要社会基础。

在中国的现代阶级斗争史上，小资产阶级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其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经常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没有条件经常参加政治活动。小资产阶级虽然也受资产阶级的压迫，但是他们对自己劳动过程的控制要相对多一些，被迫出卖劳动力以外的“闲暇”时间相对长一些，又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因而往往是政治上最活跃的一个阶级。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派，还是现在中国马列毛左派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其主要阶级成分，都是小资产阶级。

当代中国的阶级结构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无产阶级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失去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优越地位，沦为完全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从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来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领导，处于无领导、无组织的状态。一个阶级，如果没有组织起来，那么在政治上是没有力量的。

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走资派”）成功地利用了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半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农村半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可以利用的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再利用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私企、外企（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的私企往往打着“乡镇企业”的旗号）挤垮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残余的国营企业（把“老工人”的“家”给拆了）。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扮演了罪恶的、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一方面卖身投靠官僚资产阶级、甘心为资本主义复辟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幻想与官僚资产阶级争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导权。所谓1989年“民主运动”的实质，就是小资产阶级向官僚资产阶级争夺资本主义复辟主导权的政治运动。当然，很多无辜的劳动群众参加了运动，甚至牺牲了生命，但是不改变整个运动的性质。看一个运动的性质，主要要看这场运动是谁领导的；不是看这场运动表面的口号，而是要看领导这场运动的那些人他们长期一贯的政治表现，要看领导那个运动的那个阶级它的基本的物质利益在哪里。马克思讲，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长远来说，归根结底，一个阶级的政治行为是由它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1989年的政治经验说明，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和与小资产阶级打交道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抵抗不住资产阶级的进攻。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这是讲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失败。但是，失败乃成功之母。马克思说，资产阶级自己准备了自己的掘墓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迟或早，也要准备自己的掘墓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在不远的将来，还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准备条件。

要了解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不是发展壮大，要运用资产阶级的统计数据算算账。我们知道，打仗，两军对垒，合格的统帅要做到知己知彼，要了解我军有多少人，敌军有多少人，我军战斗力如何，敌军战斗力如何。阶级斗争的道理也一样，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人有多少，同盟军有多少，潜在的同盟军有多少，敌人有多少，非敌非友但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又有多少。

让我们来看一些官方的统计数据。首先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在社会主义时期，“城镇单位职工”包括所有的在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作的职工。目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包括在“国有单位”（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国内股份制企业（其中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国企”和私有化了的原国企）、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大部分属于城镇无产阶级，但是也包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1980年，中国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是1.04亿人；1990年，增加到了1.41亿人；2000年，下降到了1.16亿人；2010年，恢复到了1.26亿人；2013年，增加到了1.83亿人；此后又出现缓慢下降，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总数是1.76亿人。

从1990年开始，官方在统计“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以外，还统计了“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是官方承认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内私营企业（不包括个体）。“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不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一部分。1990年，官方承认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有57万人；2000年，增加到了1268万人；2010年，增加到了6071万人；2017年，增加到了1.33亿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是无产阶级，但是资本家也算做就业人员。

综合两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规模，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曾经大幅度萎缩。但是，自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到2010年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发展的速度加快了。

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两者相加，共有约3.1亿人，占当年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38%。如果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的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去掉，保守估计，2017年，中国城镇无产阶级的总数约为1.79亿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2%，但是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42%。

中国的资本家阶级约有2600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3%。党政官僚总数约有1700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官僚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中国的城镇小资产阶级约有8700万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1%。

中国劳动力总数中最大的部分是城乡半无产阶级。其中，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官方统计未归类的城镇就业人员和城镇失业人员）约有1.25亿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乡村半无产阶级（包括乡村农业就业人员、乡村非农业就业人员和乡村失业人口）约3.73亿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46%（其中从事农业的约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6%、乡村劳动力总数的60%）。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主义现在的阶级结构既不同于核心国家的阶级结构，也不同于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与核心国家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占人口的大多数。与外围国家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不占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并且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增长）。最主要的，在中国已经基本不存在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半无产阶级是目前中国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即使是形式上的小生产者（个体户、小农），实际上也是被资本家剥削的。

从表面上看，半无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是数量最大的，所受的剥削、压迫也是最深重的，这决定了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但是，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城镇的半无产阶级也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这些特点决定了，半无产阶级是不容易组织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是工业、建筑业、交通业、通讯业等，不是农业、手工业、小商业。这些特点决定了半无产阶级不可能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所以，从政治上的觉醒程度和组织能力来说，以及从代表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来说，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半无产阶级。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将主要取决于三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说，半无产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充当“剩余劳动力”、“产业后备军”。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必然把越来越多的半无产阶级转变为完全无产阶级化的雇佣劳动者。这样，从长远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半无产阶级的未来；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半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半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最广大与最可靠的同盟军。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充当了资产阶级的盟友和伙伴（说的严重些，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过程中的帮凶和打手）。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

发展过程中，小资产阶级也发生了分化，它的下层也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乃至在经济上逐步地无产阶级化。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激进化乃至加入马列毛左派队伍的经济基础。

概括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未来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半无产阶级占中国的大多数，又有革命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和最广大的同盟军。只要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又能争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下层向无产阶级靠拢，就能彻底孤立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为自己的胜利奠定巩固的基础。

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论述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间等级”掉落到无产阶级中来。从后来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进程看，无产阶级化的主要的实现方式，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者脱离农业生产并来到城市，成为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带来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增长，而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了无产阶级的集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交通手段和通信手段的进步，这些都便于无产阶级的组织。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还要求普遍提高一般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这又为劳动者政治觉悟的提高提供了便利。

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无产阶级数量的壮大，又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提供了物质和教育方面的条件，从而为无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准备了条件。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符合后来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的实际社会发展进程，也符合一般半外围国家的发展进程。现在，也符合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是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防御和退却。现在，就整个形势来说，还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下降，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退却。

据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报道，2011 年，全国范围从主流和社会媒体上收集到的关于工人斗争的报道 184 起（其中，参加人数超过 100 人的较大斗争 102 起）；2012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382 起（其中，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209 起）；2013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645 起（其中，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301 起）；2014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1358 起（其中，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650 起）；2015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2774 起（其中，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527 起）；2016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2664 起（其中，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483 起）；2017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1257 起（其中，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105 起）。

2018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1683 起（其中，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168 起），分别比 2017 年增加了 426 起和 63 起。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自 2011 年以来，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呈波浪式发展，在 2014-2016 年间达到了一个高潮，2017 年有所回落，2018 年又出现了新的高涨。

公开报道的工人斗争事件次数与实际发生的次数肯定有差距。据中国劳工通讯自己估计，报道的次数大概是实际发生次数的 5%-10%。所以，粗略估计，现在全国每年发生的工人斗争事件大约为一万起至两万起。如果按照每起斗争事件涉及工人 100 人来推算，每年大约有 100 万到 200 万的工人经常参与同资本家的斗争并且得到锻炼。

关于工人斗争报道的次数，是比较粗略的统计。如果要考察工人斗争的效果，还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看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是不是从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份额，从而缩小了资本家可以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份额。

先来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1980 年，中国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772 亿元，占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 17%；1990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2951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2000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 10955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份额是大幅度下降的。

201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4727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这个比例仍然很低，但是与2000年相比，没有进一步下降。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11200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2010年至2015年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比较大的上升。2015年以后，资产阶级叫嚣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反动的“供给侧改革”，企图发动新一轮私有化，像九十年代那样打击工人阶级。但是，至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增加到了12988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微降至15.7%。这说明，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初步具备了抵抗资产阶级进攻的能力。

再来看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2010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1260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017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609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与2010年相比，上升了4个百分点。（在2009年以前，没有官方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统计。）

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由于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增强，在中国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了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家和官僚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缩小了，这样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下降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获得利润。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家的投资就要下降；或者，在一个时期内，有些资本家会企图通过举债投资的方式来维持积累，从而为将来的债务危机埋下祸根。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陷入危机，而资产阶级国家也会陷入政治危机。

中国资本主义目前所陷入的困境、中国阶级斗争目前所处的形势，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以往也经历过。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还没有爆发过无产阶级革命呢？

西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不革命？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做出论断，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问题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呢？

二十世纪发生了两场伟大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但是，严格来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俄国革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俄国又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有着大量的封建农奴制残余，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程度还不如现在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不仅靠工人武装起义，而且靠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的一个主要纲领是土地革命。

在经济上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而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到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什么不革命？这个问题，如果仅从一个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来看，似乎不好理解。因为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似乎是很强大的，占人口大多数，有工会，可以组织政党，还有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机会。但是，如果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看，就不难理解。归根结底，一个阶级革命还是不革命，取决于这个阶级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仅要看一个阶级在某个国家中的地位，还要看这个阶级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在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内，西方的无产阶级是被剥削者；但是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西方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是核心国家对外围、半外围剥削的受益者。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在试图分析为什么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时就已经指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全世界的剥削可以攫取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又被用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列宁称之为“工人贵族”。列宁认为，“工人贵族”就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

列宁在创作《帝国主义论》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放弃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起来革命的希望。实际上，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党人）还普遍认为，没有掌握先进的生产力的西方工人阶级的帮助（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帮助），俄国革命是不可能单独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革命只是起着一个发动欧洲革命、发动世界革命的作用，完成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要靠

“先进”的西方工人阶级。但是，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进程是，德国革命很快失败了。到列宁临终时，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欧洲革命的期望，因而才提出，未来世界革命的希望主要在于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实际情况来看，核心国家对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剥削，不仅是通过资本输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更主要地，是通过不平等交换。就是说，核心国家所出口的商品，每一美元中只包含较少的劳动时间，而外围、半外围国家所出口的商品，每一美元中却包含较多的劳动时间。比如，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一单位美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到大约 5 单位中国劳动、7 单位东南亚地区的劳动、6 单位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劳动、5 单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劳动、6 单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劳动、23 单位南亚地区的劳动、13 单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和 1.25 单位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见“2018 年红色经济观察”第二篇）。

以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全球价值链分布为例，每一部苹果手机所带来的全部销售收入中，美国资本家的利润大约占 61%，韩国、日本、台湾、欧盟等地区资本家的利润占 12%，原材料成本占 22%，中国工人的工资占 2%，其他国家工人的工资占 3%。每一部平板电脑所带来的全部销售收入中，美国资本家的利润大约占 47%，韩国、日本、台湾等地区资本家的利润占 15%，原材料成本占 31%，中国工人的工资占 2%，其他国家工人的工资占 5%。

不平等交换的实际作用，是将全世界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核心国家。核心国家的资本家又用他们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不仅仅是“工人贵族”，而且是西方工人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这就使得西方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得以分享一部分外围、半外围国家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参与分享世界范围剩余价值的方式，就是高工资、高福利。以美国来说，每年通过不平等交换所攫取的超额剩余价值大约相当于世界其他地方 9000 万个劳动者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些超额剩余价值，美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约要下降三分之二。

正是在这样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基础上，才有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相对缓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相对稳固。相应地，改良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也一直占统治地位。

在过去几十年，情况又有一些变化。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搞反攻倒算，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甚至不惜主动制造经济危机，用高失业来压迫工人阶级。跨国公司还将资本大量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外围、半外围国家，想要迫使西方工人阶级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这些倒行逆施，后来就统称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就是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反动的一部分）

在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的影响下，西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享受着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客观地讲，今天的西方工人阶级仍然是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仍然享受着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劳动者所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就这个意义来说，西方工人阶级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个包袱里面装的就是高工资、高福利。如果没有半外围、外围劳动群众首先发动革命，帮助西方工人阶级把这个包袱卸下来，想要指望西方工人阶级自己主动放弃从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中所得来的利益，那是不切实际的。

半外围

到目前为止，咱们还一直没有介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半外围有哪些国家？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又有什么特点？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在与核心国家贸易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就是说，它们一般不得不用较多的本国劳动来交换核心国家较少的劳动；它们在与外围国家贸易时，又处于剥削的地位，就是说，它们可以用较少的本国劳动来交换外围国家较多的劳动。

以中国为例，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一单位中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到大约 4.4 单位南亚地区的劳动和 2.5 单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中国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是，大约 5 单位的中国劳动才可以交换到一单位美国劳动，4 单位的中国劳动才可以交换到一单位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劳动，中国又处于被剥削者的地位。

就中国的整个对外贸易来说，每年中国对外出口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大约相当于 8000 万个劳动者一年创造的价值，而每年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大约相当于 4000 万个外国劳动者

一年创造的价值。两相抵消，中国每年对外净输出相当于 4000 万个劳动者一年创造的价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在中国上升为半外围以前，半外围大致分布在苏联、东欧、南欧、拉丁美洲、中东、东亚的韩国等地区，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主要从事可以带来垄断利润的、有高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高技术”工业、金融业等）；外围国家则一般从事有高度竞争性的、低附加价值的农业和采矿业。半外围国家则分别从事中等附加价值的工业生产（如比较成熟的、规模化生产的重化工业）和具有周期性高附加价值的能源采矿业（如石油、天然气）。

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一般要低于核心国家，但是高于外围国家。当半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无产阶级化程度会逐步提高，无产阶级的数量和组织程度也会逐步提高；这时，无产阶级就会提出越来越高的经济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改善劳动条件等），小资产阶级也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且要求更加广泛的政治权利（如要求实行言论自由、政治民主）。与核心国家不同，由于不能够从世界市场上得到超额剩余价值，半外围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取得内部的阶级妥协。如果要满足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就会减少半外围国家可以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从而使得这些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如果拒绝满足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阶级矛盾就会急剧激化，从而使得半外围国家陷入政治危机。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世界各地地区的很多半外围国家都陷入了这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这里举几个例子。葡萄牙是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但是，在西欧，又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从 1933 年起，葡萄牙就处于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之下。1950 年时，葡萄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3338 美元（按照 2011 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大致相当于中国在 1998 年、1999 年间的水平。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葡萄牙经济高速增长。1950-1973 年间，葡萄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三倍多，年平均增长 5.4%。到七十年代初，葡萄牙在非洲的海外殖民统治风雨飘摇，内部阶级矛盾激化。1974 年，倾向进步的左派军官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推翻了长达四十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一度出现了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可能。在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以后，政权最终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今天，葡萄牙仍然是西欧最穷的国家。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巴西曾经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过一个进步政府。很快，在美帝国主义的暗中帮助下，巴西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政府。1967 年，巴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086 美元，大致相当于中国 2002 年的水平。1967 年至 1980 年，巴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年平均增长 5.6%，当时号称“巴西经济奇迹”，巴西被国际资产阶级封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从七十年代开始，卢拉开始领导巴西汽车制造业工人的斗争。八十年代初，巴西债务危机爆发，巴西的资产阶级统治陷入危机。八十年代中期，巴西资产阶级放弃军事独裁统治，用资产阶级民主来继续欺骗人民，并加紧推行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反动经济政策。1989 年，卢拉第一次代表巴西工人党参加总统大选中，获得大量选票。此后，巴西工人党赢得了若干地方选举，工人党的候选人当上了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的市长；但与此同时，工人党也逐步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蜕变为一个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政党。2003 年，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利用当时能源、原材料价格高涨的有利形势，巴西大量出口石油、铁矿石，为卢拉政府实行一些温和的社会改良政策提供了资金。2011 年，卢拉下台。此后，世界市场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巴西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再度激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波兰人民共和国是东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波兰没有经历过广泛发动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波兰统一工人党（即波兰的共产党）是靠苏联的支持夺取政权的，统一工人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长期紧张，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长期理不顺。六十年代末，波兰经济增长放慢，波兰统一工人党想要取消食品等价格补贴，以提高积累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引起波兰工人大罢工，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被迫下台。哥穆尔卡下台后，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幻想用大量举借外债的方法，来一方面给工人增加工资和福利，另一方面又可以进口西方的先进设备，再增加出口来偿还外债。结果，1980 年，债务危机爆发。那一年，波兰工人阶级组成了团结工会运动。

八十年代，波兰政府实行军管。在这一时期，团结工会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了作为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反社会主义的波兰自由派知识分子手里。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波兰进行民主选举，团结工会上台，实行了反动的新的自由主义政策，国营企业全部私有化，大量工人失业，价格全部放开，引

起恶性通货膨胀，对外资全面开放。在强加给波兰工人阶级巨大的经济灾难后，波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一个本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被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又反过来将私有化、失业、通货膨胀等反动经济政策强加给工人阶级，这是十分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也说明，工人阶级如果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单纯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将是多么危险，也是多么愚蠢。

1963年，朴正熙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南朝鲜的政权。从1963年至1979年，南朝鲜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号称所谓“汉江经济奇迹”。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此后，南朝鲜政局动荡，工人、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最终迫使南朝鲜当局放弃军事独裁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

1997年，韩国遭遇严重经济危机。此后，由于中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韩国资本家得以一方面将低端工业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向中国出口高端的机械和电子设备，渡过了危机。现在，仅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韩国达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水平。

上述几个半外围国家分别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波兰则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党专政），并且在独裁统治时期都出现了长时期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在长期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队伍发展壮大，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在发展。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斗争高涨的局面。由于这些半外围国家不掌握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无力同时满足资本积累的要求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被上述矛盾所包围的半外围国家就会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进而发生革命形势。

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已经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在发展，已经初步出现了无产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的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在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要求；这些要求，或迟或早，要发展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些，都是中国与以往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相类似的地方。

另一方面，上述几个半外围国家，在发生革命形势以后，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波兰还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上述几个半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暂时）解决矛盾的途径也有所不同。葡萄牙、波兰后来都加入了欧盟，成为西欧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巴西是世界上一个主要的能源、原材料出口国。韩国则是借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机遇”，靠着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得以从原来半外围国家的地位上升为一个核心国家。

这些半外围国家的历史经验，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在经过一番斗争后，仍然免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就是说，与其他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资本主义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作为一个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从核心国家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还需要从外围国家进口许多原材料；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还要享用一些只有核心国家才生产的高档消费品。为了支付这些进口，就必须有大量的出口。所以，一个半外围国家必须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维持一定的出口竞争力（成本要足够低，产品要有销路）。

为了实现这样的出口竞争力，有的半外围国家是靠自己的自然资源丰富，可以出口某些具有周期性高价值的能源和原材料。像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国家，则主要是靠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再结合其他一些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如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局相对稳定等），从而取得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地位。

但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随着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越来越多，中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积累模式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而中国又不具备大量出口自然资源的条件。这样，除非中国资本主义能侥幸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将无法在半外围的范围内得到克服。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能不能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一部分呢？这当然是所谓“工业党”、“强国派”所梦想的，实际上也是左派队伍中一些“中帝论”者在事实上所相信的。但是，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前面说了，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是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家剥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个别的工人，因为一些偶然因素变为资本家，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说，有相当于全部工人阶级五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工人竟然都可以变成资本家，那显然是荒唐的。这么多工人，如果都变成了资本家，每个资本家，比如说至少要剥削 10 个工人，社会上有这么多工人可供剥削吗？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配结构虽然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完全一样，但也是建立在占世界人口少数的核心国家剥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基础上。历史上，核心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六分之一，外围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一般保持在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每维持一个核心国家的居民，就需要剥削来自于四个外围国家居民的剩余价值。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变成了核心国家，那么核心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可能就要增加一倍多，达到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按照历史上核心国家人口与外围国家人口的比例，外围国家的总人口就必须达到全世界总人口的 130% 至 160%。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和荒唐的。

除了这个最基本的原因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决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核心国家以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要想成为核心国家，就必须掌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高精尖的、能带来垄断利润的先进技术，并且不是在个别的领域，而是在大多数领域。

但是，要发展现代的高精尖技术，就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培养许多专门的人才，并且反复试验。如果是搞社会主义，那么国家可以为了长远的目的，将全国的资源 and 人才集中起来，用在关键的地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国一盘棋，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的工厂和研究机构都可以为了一个总的目的而相互支援、相互协作，不提条件，不讲报酬，像两弹一星那样。

但是，资本主义就不一样了。资本家搞投资，是要回报的，如果风险大，所期待的回报就更高。如果搞一个高精尖项目，需要其他领域资本家的配合，其他领域的资本家也要回报。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开发一项新技术，不可能一次成功，即使搞出来了，在开始一个阶段，生产成本肯定比较高，质量和性能也往往比不上核心国家已有的同类产品。质次价高，产品就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投资就无法回收，更不要说利润。没有利润，又收不回成本，资本家为什么要投资呢？

有的朋友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号召中国资本家，要自觉地多购买国产的高技术产品，这完全是与虎谋皮。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发展起来的的中国资本家，特别贪婪，也特别短视，完全是急功近利。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他们往往不惜谋财害命（比如假奶粉、假疫苗），哪里会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做出牺牲。中国某些资本家搞出来的一些所谓“自主知识产权”，或者完全是假的，或者是西方跨国公司为了获取更大的垄断利润而转让的一些已经过时的技术。

所以，作为半外围国家，只要是搞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一般规律，不可能在真正的高技术领域赶上核心国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韩国，一是有美帝国主义的有意扶持，二是借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机遇”，可以剥削广大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即使是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内部也实行了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政策。

中国是一个靠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来进行资本主义积累、在世界市场上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就决定了，一旦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起来斗争，廉价劳动力的积累模式就将无法维持，从而陷入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总量巨大、人均不足。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无法通过在半外围范围内进出口能源、原材料等办法来解决。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建立在核心剥削外围、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基础上。这又决定了，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中国在整个体系中就只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决不可能上升为核心的一部分。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将无法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解决。

大变化

前面一直在说，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陷入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不远的将来”是多远呢？

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经验来说，1949年以后，大约每隔二十年，就有一次大变化或者大动荡。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不到二十年后，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再过二十多年，1989年，爆发学生“民主运动”，中国一度出现革命形势。

2009-2012年，中国有两件大事：2009年的通钢工人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大的一次工人反私有化斗争；2008-2011年薄熙来在重庆进行的社会改良实验，反映了中国阶级矛盾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分裂。2012年的重庆事变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上层最后放弃了通过有限社会改良来缓和社会矛盾的尝试，而是下决心实行以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从那时算起，再过二十年，到2030年前后，中国将会怎样呢？

这个二十年一大变的说法，好像有些“迷信”，但有一些客观规律在里面。一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来说，每隔大约四十至五十年，会发生一次长周期；在长周期的后半段，会有严重的经济危机、战争、革命等重大动荡。二是，在重大的社会变革发生以前，首先要有新的进步和革命思想，而新的思想又要来源于人们对于自己周围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观察和反映。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引起人们思想的变化，再引起人们新的实践，往往要一代人的时间。二十年，大体是一代人成长起来所需要的时间。

除了上述的二十年或四十年的周期以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共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不远的将来”将要陷入深刻的危机。如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靠的是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但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可供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廉价的“产业后备军”正在萎缩。以中国农村的半无产阶级队伍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业后备军”的主要来源），2000年，中国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总数（包括农业劳动者、在农村就业的“农民工”和农村失业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为5.01亿人，此后即趋于下降；2005年，下降到了4.65亿人；2010年，下降到了4.23亿人；2015年，下降到了3.87亿人；大约每隔5年减少4000万，每隔10年减少8000万。按照这样的速度，至2030年，中国农村的“产业后备军”可能减少到不足2.7亿人。

“农民工”是中国廉价劳动力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民工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将完全无法维持。据国家统计局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年，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总数的58.4%，50岁以上的占15.2%；2017年，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总数的52.4%，50岁以上的占21.3%。2013年至2017年间，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平均每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平均每年增加约1.5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30年，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将下降到约33%，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将增加到约40%。到那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怎么能维持超长劳动时间、高劳动强度的血汗工厂模式？工人阶级又怎么可能长期继续忍受他们的残酷剥削？

据同一份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全国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占10.3%，比上一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全国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比例将增加到2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个农民工中，就将有一个大学生。虽然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与阶级觉悟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但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农民工毕竟视野更加开阔，对各种政治问题更加敏感，对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有更高的要求，因而也更有可能在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

一方面，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在客观上（生理上）无法再承受野蛮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剥削；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由于教育水平提高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必然要经常地组织起来，要求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必然要颠覆中国资本主义的秩序，突破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

为了维持作为世界主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需要剥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原材料。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进口石油约占消费量的70%，这就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石油价格冲击的巨大风险。如果世界石油产量在未来几年开始下降，或者中东地区发生重大的战争或革命，都可能触发中国资本主义的能源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

未来的大变化将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呢？让我们来考虑几种可能性。

传统的革命道路，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二是井冈山的道路，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持久人民战争，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

这两种革命道路，都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

那么，在将来的大变化以后，中国能不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呢？就像上述的葡萄牙、巴西、波兰、韩国那样？

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存在的条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力量相对均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达到了某种均衡，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的斗争也达到了某种均衡，而打破这种均衡对于几个方面的代价都比较大；这时，为了将这样的均衡相对地“固定”下来，各个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几个集团愿意用宪法、法律等方式将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限定在某种“规则”的界限内，从而减少斗争的成本，避免因斗争失去控制而导致各阶级共同毁灭的结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才能得到实行并得到巩固。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有绝对优势，或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绝对优势，或者无产阶级虽然没有绝对优势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所无法容纳的范围，资产阶级民主都是搞不下去的。

如上所述，中国未来的危机，将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因而也就不可能在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形式下（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来实现各阶级之间的某种“均衡”。从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来说，中国资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暴发户，因而特别贪婪和短视，他们为了贪图眼前的利益，是决不愿意受任何“规则”束缚的。制造假选票，伪造选举结果，恐吓暗杀候选人，贿赂选民等，都将是资产阶级破坏正常民主程序的看家本事和拿手好戏。中国资产阶级的贪婪卑鄙本性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在中国实行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组织起来，因此，在大变化的初期阶段，无产阶级想要一下子就取得在全国范围的优势，也是不现实的。

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实际上，仅仅有枪杆子，还是站不住脚的。红色政权要存在，不仅要有工农武装，还必须有群众和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才能养兵、养干部。

任何政权要存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都必须解决财政问题。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也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目前，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收入、地方政府收入大约各占一半，但是，地方政府支出大约占全部政府支出的9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大约有一半的支出要靠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一旦中央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将无法再补贴各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如果这样，各个地方政府也就无法再满足教育、医疗、治安等起码的公共需要。

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不管群众了，群众就坐在那里等死吗？肯定不是。当许多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时候，这些地方的群众将不得不自动地组织起来。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将会站出来，把积极分子、普通群众团结起来，用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群众代表大会、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方式自己把地方管起来，以解决地方的各种迫切需要。在无产阶级占优势的地方，这样的群众自治组织就会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

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其迫切的任务，还不是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立即着手解决群众的各种迫切要求，培养干部，扩大和巩固在群众中的影响，将自己变为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样的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燎原。

在资产阶级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团团包围中，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能够得到存在和发展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条件下，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将有人和、地利、天时三个有利条件。

首先，地方工农民主政府可以解决资产阶级地方政府所解决不了的群众的各种迫切要求，能够让群众有工作，有饭吃，有学上，得病可以看病，能够消灭黑社会，让群众安居乐业。只要做到这一点，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就可以得到“人和”。

其次，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矛盾重重。除了人民群众拥护我们以外，一些资产阶级的地方政府也可能不反对工农民主政权的存在（以牵制其他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会面临很多困难，财政紧张，干部短缺，军队可能不听指挥。在那样的形势下，如果与工农民主政权为敌，可能会给他自己背上一个沉重的大包袱。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倾轧，勾心斗角，马列毛左派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就是“地利”。

最后，在整个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危机都无法解决，而是愈演愈烈。在那些没有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地方，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资产阶级政权都解决不了他们的矛盾，也克服不了危机，满足不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工人、小资产阶级每天的斗争都会使他们削弱。在资产阶级统治区，越来越多地方的群众将会自己组织起来，把那里的地方事务管理起来，并逐步地接受马列毛左派的领导。这就是“天时”。

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有利条件，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实行正确的政策和路线，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注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就不仅能得到巩固，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按照这样的办法，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然后连成一片，占领一大块地方，直至在全国范围取得优势。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做出了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预言。

到目前为止，西方工人阶级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的这一伟大预言，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

世界历史的发展正在中国造成这样一种条件，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即将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必然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

马克思所托付的伟大历史使命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马列毛主义者）一定能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外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中国无产阶级也敢做。中国的无产阶级，要让思想冲破牢笼，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要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前列！